



- 张 昕：霸气与感性的学术结合
- 李思雨：美国司法政治实证研究视野中的“反多数难题”
- 王晓笛：国民党闹够了，也该做事了
- 刘 畅：“返乡体”与农裔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困境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冯绍雷

沟通的渠道

交流的平台

启发智慧

砥砺思想

分享知识

奉献感悟

吴文



也来谈谈国关人的坚守

张莹

古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某一日，掩卷沉思，黄粱一梦二十年，读书独占十余载，其意义究竟何在？对一门专业的修研到何程度为最佳？我想，有此种困惑的绝非我一个。当下扁平化、物质化的社会，罕有人会真正的醉心于深入阅读，潜心学术成了一种近于荒诞的、堂吉诃德式的对主流社会的反叛。

心情很复杂。如我这般，自始至终，把爱与美作为生命最重要的元素，将人生定义在小女子柴米油盐的安逸中，难免会质疑虚幻的国际关系能给予人什么，发觉国关并非平生志趣所在，而中道改志者也并非少见。

初入此门，目之所及尽是虚幻缥缈的理论著述，可有可无的时政预测。仿佛全是秀才的纸上谈兵，所谓的高谈阔论、针砭时弊不过是在耍花枪。忽有一日，发觉自己看时政新闻时竟不自知地套用了沃尔兹的观点，不自知地用建构主义的逻辑分析巴黎暴恐案。于是领悟，国关对人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它拓宽人的视角，给人逻辑化、理性化的框架，让思想表达能够在繁芜的夹缝中找到依托，不再单薄贫瘠。而之前门外汉般的种种偏见，不过是因为没有钻研进去罢了。

前两日第88届奥斯卡获奖结果揭晓，小李子九转功成，结束了漫长的陪跑。有人说，扮丑、弄脏、受罪、大幅度改变体重、让肉体 and 心灵遭受巨大折磨，这是奥斯卡指明的出路。这一逻辑具有其合理性。学术研究者也应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姿态，如此，方可觅得真知。

读书人应不忘社会担当。2015 寰宇回首，国内之大事天津爆炸案不得不提。扼腕叹息那些逝去的生灵，考察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古往今来，国内国外皆有之。叙利亚动乱、穆斯林难民危机、巴黎恐袭让乌托邦式的和谐相处再次成为幻影。

正义与邪恶较量，我们应当无惧无畏；天灾人祸面前，应考其根本，从容应对。中华民族正值转型关键期，做好新时代的引领者与建设者，每个国民都任重而道远。王蒙说，那些被恐怖吓破了胆的人，请你们走开。历史将不会因为害怕付出代价而停止它前进的步伐。你可能会感到沮丧，你有权利感到沮丧，但我没有权利感到沮丧，因为我是中国今天的主人。

对知识葆有敬畏，对学术满怀推崇，这才是一个社会向上的力量。世间纷扰，在物质洪流中保有一颗坚定的心，在通俗的社会里葆有深刻的灵魂，在欲望满溢的世界葆有高洁的理想，这是对每个国关研究者的期盼。



2015 年第 4 期
总第 17 期

主 编：
刘 畅

副主编：
过梨雨 刘娅楠
王志浩 杨 静

编 辑：
(按拼音字母为序)
陈子越 过梨雨 刘 畅
刘娅楠 刘一鸣 孙 莹
王志浩 夏真真 杨 静
张 莹

封面题字：
冯绍雷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
研究院

《闻道》编辑部
主办

目 录

卷首语

也来谈谈国关人的坚守
.....张 莹

学人访谈

张昕：霸气与感性的学术结合
..... (01)

民主迷思——美国篇

美国司法政治实证研究视野中的“反多数难题”
..... 李思雨 (08)
美国对“藏独”组织的民主援助
——以国家民主基金会在西藏的活动为例
..... 张 莹 (23)

政党轮替——台湾篇

国民党闹够了，也该做事了
..... 王晓笛 (35)
诈骗集团国家
..... 陈斯俊 (38)

路在何方——中国外交篇

China's New Diplomacy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Methods, Obj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 Hajer MZOUGHJI (43)
利益攸关方、建设性合作者与命运共同体倡导者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目的
性..... 陈子越 (73)

百花齐放

- “返乡体”与农裔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困境
.....刘畅 (86)
- 真理、政治与共和的危机
——《过去与未来之间》读书笔记
.....陈永沛 (92)

国关要闻

..... (99)

《闻道》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管,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闻道》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本刊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座414室

邮编: 200062
邮箱: wendao_ecnu@sina.com
网站: <http://www.saias.ecnu.edu.cn/il265.htm>

注: 未获本刊事先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学人访谈

张昕：霸气与感性的学术结合

学人小传

张昕，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晨晖学者、院长助理。曾担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讲师、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系访问教授。2001 年于中国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硕士毕业后，2010 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主要为比较/国



际政治经济学、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内政与外交等。掌握英语、俄语两门外语。

《闻道》：首先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张昕老师成为这一期的嘉宾，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闻道》的访谈。我们都知道，张昕老师您在本硕期间的学习一直是世界经济专业，而博士则是转向了政治学，如此重大的转变可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当时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态促使您决定投身于政治学领域的研究？

张昕：关于这点，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一方面想继续求学，但是对所学的经济越来越缺乏兴趣。我对经济现象始终抱有浓厚兴趣，在本科期间的学习让我收获良多，但是复旦读完硕士后我的困惑感不断加深，觉得硕士阶段学习的几年时间里，对经济

学的学习并没有如我想象中的那样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世界。就是在这样一个略显迷茫之际，我决定尝试一下转变专业来继续求学之路。后来，每当我再回过头来仔细思考当初为什么会渐渐对经济学失去兴趣时，可能是主流经济学几个方法论和哲学层面的某些特征让我感到不怎么满意吧。一个是它极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起点，另一点是它过于强调价值中性的实证研究。还有就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权力”，尤其是经济学重点研究的平等交易背后之间隐藏的权力关系。在之后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习过程中，对这一部分的疑惑我得到了相对完整的回应和解答。转换专业这个决定现在看来一个很好的选择，给我提供了一个和经济学仍然存在相关性、逻辑上有一定关联的全新角度的学习机遇，而且我也很喜欢政治学这个学科，不仅仅是对政治学，与之有重合的社会学、尤其是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我也由相当大的兴趣。

《闻道》：这是您自己做出的决定还是由其他什么因素决定的？

张昕：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事实证明，这个选择还是很正确的。我有个本科同班同学比我早两年做出类似的选择，他当时在读国际关系，和我提到过可以考虑一下政治学，但这并不是最终影响我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我最初申请博士班时想主攻国际政治经济学，因为感觉从我当时的专业背景转到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自然的事，但是后来各种因缘际会吧没有这样做。我在美国刚开始博士班学习时分配给我的导师确实是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属于该领域比较领先的一位专家。但后来很快我觉得那位导师所从事的国际经济学研究与我在复旦学习期间所读的经济学太接近，并不是我想学的那种做法。当然，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底子还是在那里的，对我后来的政治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闻道》：那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您从经济学跨到政治学以后，先前存在的疑惑也随之迎刃而解了呢？

张昕：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当时我在的那个系推崇的还是美国主流政治学，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科学”，因此系里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中青年教师在教学和训练上的方法其实和我之前不怎么满意的经济学重合度相当高。为此，我一开始其实试图让自己重新进入这个体系，把包括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在内的这套知识又学了一遍。事实证明，就是我还是不太适合这个体系。在博士班又过了几年之后，我才渐渐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途径。这一个摸索的过程耗费的时间相对较长，难度也不小。相比我一些同学，我不是那种不管自己接受不接受或者有

没有感触，就按照设计好的职业路径顺着往下走的人，因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我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坦率地讲，这种态度对我之后的职业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笑）

《闻道》：张昕老师，您从事这个专业的研究和学习也很久了，您觉得相应的世界观会发生变化吗？

张昕：答案是肯定的。我没看过政治学或者社会学领域的调查，但是我看过一个北美经济学领域的调查，我们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称为三观，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学专业人士的“三观”和其他专业的同行有非常明显的差别。比如说，他们会最不愿意做慈善、最笃信自我奋斗等等。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偏好拥有同一类“三观”的人更多被吸引到这个专业里面去。另一方面，专业学习和训练又会反过来塑造进入这个专业个人的价值观。还有比方说在北美学界，经济学里“白男”就要多一些，而且学术上占主导地位更明显，而社会学里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学者就要多出很多，这也会对刚才说的“自我选择”和学生在专业过程中被型塑产生一定的影响。

《闻道》：老师，我们能知道您当时硕士毕业后有想过直接工作吗？或者说当时您就已经决定要继续走学术道路？

张昕：（笑）怎么说呢，我本科毕业后继续学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想工作，因为我在一些单位的实习经历让我感到很无趣，觉得自己不适合那样的工作，企业文化、机关氛围就我个人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喜欢。当然我不否认这些职业可能对别人来说是合适的。而且我当时对读书的兴趣还是相当之浓厚，想继续求学的想法很强烈，至于说是否一定要走很学院派的道路，或是从事其他相关的职业就有些朦胧，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并不是十分的清晰。但有一点我还是清楚的，那就是第一我不想做哪类事情，第二就是想多读些书，这两个想法在当时来说是十分清晰的。

《闻道》：我们知道您接受过的很多采访都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在怎样一种机缘巧合下去从事了俄罗斯研究的？

张昕：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我给的答案都一样。一是，其实刚过去美国的时候对于具体专攻哪个领域的想法还是比较朦胧，只是很快决定不再继续国际政治经济学。二是初到美国，有一些老师和朋友就觉得，你是中国来的，会不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会不会研究这个？你会发现这些问题背后有个很强的模式。因为中国学生过去那里后十有八九会选择研究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农村治理、农村选举、企业改革或者抗争政治这几个

议题。这让我感觉不是很舒服。我觉得我有这个心态和能力突破自己的身份限制（也可能是身份优势）来和同行竞争。而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就很自然地学习中国政治，研究那些大家认为中国研究应该研究的题目。此外，我博士第一年选的课里有一门叫“转轨的经济经济学”，开课的老师就是我后来的导师。这门课的内容触及到我以前学的经济学中感兴趣的经济现象，但它里面又有许多很清楚的政治视角，比方说把私有化看成一个政治过程，把宏观经济调控通过膨胀控制看成政治过程，这个以前我是没有接触过，我那时才知道，原来是可以这样来研究这些经济现象的，已经有这样的理论工具在，所以之后迅速决定把这类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

另外，我慢慢发现在美国读书还有一个好处，虽然不是全部、但是相当一部分教育资源是对外国人开放的。包括学语言，俄语就是其中之一。我很快发现在那里完全可以从头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我是博士班第二年暑假开始学的俄语，学得很辛苦，到第三年尤其累，因为当时自己正在准备资格考，加上语言到了比较难的阶段，一度考虑放弃。我很庆幸自己最终坚持了下来，没有中途放弃。

学了两年俄语之后，2005年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待了三个月，那里的所见所闻对我而言确实有足够大的吸引力，从那以后我就明确了把俄罗斯作为长期关注的对象和以后职业发展的一个中心。有一个这样国别的关注重点有效地帮助我开拓了视野，在文化上、在职业发展上都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窗口。这点我很感谢那些帮助我理解和认识俄罗斯的老师，感谢在美国和俄国一起求学、一起研究俄罗斯的同学和朋友。

我看到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学包括去美国留学的，好多人下意识里都会把“古今中西”到最后都变成“中美对立”。当你的视野里有第三个点、第四个点的时候，你的世界观可能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在给每一届学生上课的时候都提这样的建议：如果有兴趣，可以尝试在英语之外再学一门语言、尝试集中了解美国之外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避免你的世界只有中国、或只有中国和美国。

我现在还有计划再学一门语言，再关注一个到两个政治单位，不一定是国家，但这个政治单位我希望是在大框架下相对比较小的、边缘化的一个单位。因为我现在相对熟悉的中美俄，都是太大太强，在一定时空里都是占据霸权国家地位的一个单位。但我还有计划通过去关注一个历史过程中始终处于相对比较边缘化、被征服、弱者的、小的单位，通过这个视角去刺激你的三观，转一个角度看世界，这是我后面一段时间想做的事情。

《闻道》：张昕老师，我们都知道，学习语言的过程很吃力也很辛苦，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学习语言的方法吗？

张昕：我本身对语言非常感兴趣，我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只是集中学习俄语，日语和西班牙语只是入门的一点皮毛而已。同时学两门语言的时间非常短。学语言的方法和方式可能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各有不同。我自己由体会的一个较为简单的技巧就是重复，包括调动不同的媒介进行重复。举个例子，对某一个新单词，我们可以读一遍背一遍，最好还要再听一遍，可以选择通过新闻报道，也可以通过观看电影电视等。这样通过不同媒介的反复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记忆效率，也可以加深对这个词汇的认识，更好地理解一个单词在不同情境下的使用组合与含义上的细微差别。当然，我们还可以把单词灵活运用在对话中，能够巩固记忆。除此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即语言需要日常积累。我自己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比如看美剧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单词或者一种新的说法，我会马上去查，有时候到了晚上还会进行反思，想象今天碰到的几个新的词获词组等。再者，我会在口语和写作上进行适当的模仿。有的同学会背例句和文章，这个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可行的。不管是听也好，读也罢，你一定要有学习意识，要保持一定的警觉度，否则就像大水冲在青石板上，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这样，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不会单单注意情节，而会注意它的语言用法。这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的过程。我还是鼓励大家要是有机会可以多学点语言，不论你最终学的程度如何，哪怕你学的很初级，至少一门新的语言能够帮你打开一扇窗户，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可能让你的人生都会变得更加丰富精彩。对语言的学习让我在这方面受益匪浅。

《闻道》：国际关系这个专业的学习让我的视野开阔了许多，也对这个世界认识的更加深入，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理解的不是很透彻。我们经常说知己知彼，现在我们的专业现状就是，知彼比较多，知己比较少。当我们回到中国看中国时，觉得很难进入，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

张昕：我们进行比较研究其实有大量的中国因素在内：如果你想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没有比较的视野是得不出的，包括我们常说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之所以称为文明国家就是因为它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个结论就是比较之后的结果。所以对世界上其他单位的理解可以刺激了你对母国和自己身处的这个单位的理解。我对俄罗斯的研究其实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中国。

比较政治学的训练给我一个强大的动力和意识。比如说，发生了一件事，我会经常想换一个时空背景是不是同样的逻辑？一场运动在一个时空条件下是一场革命，在另外一个条件下就是一场改革，为什么？再比如说，现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特殊性的说法很流行，“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提法也在重新得到重视，但是这些结论都只有在比较基础上才有意义，凭空说是不可行的，

很多结论没有比较显然是得不出来的。虽然说我目前对国外的关注比较多，但是这些关注对于我理解中国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我认为比较中外之间的差别本身就是相当有益的一件事，只有认识别人是什么才能更好地认识我是什么。男女的差别就是在比较中得出的。通过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世界，理解事物的发展。

闻道：您在研究类似于俄罗斯这样的非民主国家中，是否对于如何更好地看待民主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张昕：虽然在北美比较政治学中，政体的划分、民主与威权政体的比较是核心中的核心，但我对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特别感兴趣，这样的政体划分很可能迷失了更加本质的东西。我相对比较感兴趣的点，包括一个政治制度或者人与人之间的游戏规则，怎么样容纳我们不同观念和利益。这种利益冲突可以表现在很多层面。最底层的我们个人和个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一级一级往上升，企业之间、族群之间，最高的可能就是国家之间了。这是我比较集中关心的一个相对抽象的话题。

另外，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有没有新的特征，新的特征怎么样在不同政治领域或经济领域体现。对于你们提出的最近的欧洲移民危机，我对这个没有专门的研究。但从我关注的核心出发，我直觉上会追问：欧洲目前的难民危机是不是跟一个资本主义长的经济周期有关。上一个增长周期在世界不同的空间产生了巨大的再分配效应（包括财富、也包括安全等基本公共品的再分配），可能导致了这么短的时期内出现这么多难民。我是希望以后能顺着这些思路继续从事一些研究。比如我现在在研究的就包括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角度出发看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一组新兴国家内部国民经济的体系性特征，以及这样的内部体系特征如何反射到这些国家对外的政策上（包括对于全球治理等全球公共品需求的变化）。

《闻道》：跟张昕老师的聊天非常愉快，与您交流的过程中也让我们收益颇丰，同时也让作为学生的我们对您个人、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最后，想请你对《闻道》杂志说几句

寄语？

张昕：我知道《闻道》杂志出版周期加快了，大家也有一定的压力，对从事《闻道》编辑工作的同学表示感谢，这是活跃学生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舞台。我建议可以适当性地减少一些学生学术性论文，可以多发表一些表达学生内心想法的一些文章。前面有两期，有的同学谈到了自己的海外留学经历和不同领域的学习体会，我觉得就比较有意思。大家可以利用这个舞台交流一些成长的经历，也可以多发一些影评书评的东西。



（采访：刘畅、刘娅楠、夏真真、张莹
编辑：过梨雨、刘一鸣、孙莹
责任编辑：过梨雨）

民主迷思——美国篇



【编者按】学者们永远津津乐道于“民主”的话题，“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带来和平”、“民主也有阴暗面”……今天我们换个视角谈“民主”。“民主”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政治实践，在我们的视野里，民主亦是一种“碰撞”和“反思”。本期《闻道》开辟“民主迷思——美国篇”专题，通过截取美国民主生活中的两个侧面，反思美国民主在与国内司法政治和与“藏独”组织的碰撞中，是如何自处的。

美国司法政治实证研究视野中的“反多数难题”

李思雨*

【摘要】司法审查作为美国宪政体制的特殊制度，其民主性一直是众矢之的。虽然司法机关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和中国学者在利用规范性研究方法研究其民主性和多数性时依然困难重重。美国司法政

* 李思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治采取实证研究的策略，观察法院的构成、决策和政策执行各个阶段及其与民意和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由于法官受到自身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民意的多重限制，很难造成所谓“反多数难题”。

【关键词】美国最高法院；反多数难题；司法政治；实证研究

一、引言

美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原则——三权分立和权利的制约平衡——体现在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环节上，那就是司法审查。非民选产生并任职终身的联邦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可以宣布：经民众定期选举产生的国会通过的法律，或者总统的行为违反宪法，故而无效。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和珍视大众民主（popular sovereignty）的国家，允许这样看上去“反民主”的体制存在呢？1962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历山大·比克尔（Alexander Bickel）在《最不危险的部门》一书中正式将这一问题归纳为“反多数难题”（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即司法审查与民主原则相悖这一问题。^①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问题吸引着美国学术界的浓厚兴趣。

②

随着我国学术界对美国最高法院研究的逐步兴起，^③“反多数难题”也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然而，国内绝大多数的研究是理论性和规范性的。简而言之，就是试图从理论上使司法审查制度和大众民主原则相协调；或

①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1962.

② 例如切莫林斯基(Erwin Chemerinsky)将这一难题称为“宪法和宪法学的主导性范式”，(See “The Supreme Court, 1988 Term- Forward: The Vanishing Constitution,” 103 *Harvard Law Review* 43 (1989). 61.)。弗里德曼 (Barry Friedman) 将围绕这一难题产生的研究称为“学术迷恋”，See “The Birth of an Academic Obsessio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Part Five,” 112 *Yale Law Review* (2002), 153.

③ 对于我国学术界对美国最高法院的研究进程，可参考胡晓进，“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国最高法院的研究与认识”，《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

者司法审查应该如何行使，才可以避免对多数民意的不合理干涉。^①

然而，近二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对于司法审查的民主性研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重点已经从规范性研究转换到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不寻求为司法审查“开药方”，而是借助史实、数据等，审视最高法院是否真的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反多数”的力量；有没有哪些因素促进或者限制其“反多数”性质。而“多数”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根据笔者的观察，实证研究一般假定，“多数”既包括以多数统治为原则、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及其意志（即下文所称的多数主义政府分支），也包括全体人民中的多数意志。简而言之，“多数”指的是国会、总统的意志以及科学民调产生的直接民意。

20 世纪 20-30 年代正式诞生的现实主义法学，为以实证方法研究最高法院的反多数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前提。一千多年来的英国普通法传统认为，法官应该遵循法律和先例，避免“感情用事”。现实主义法学则反对从抽象的概念和逻辑推演中，找出法律的原本含义。相反地，现实主义法学积极面对法官的个人因素和政治环境对于判决的影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18 世纪末制定的美国宪法的文本与现实生活的张力（tension）越来越明显，传统法学所片面追求的“科学方法”、甚至是“大一统的理论”，被有的学者解释为“迫切地追求确定性”^②。

美国学术界的实证研究表明，联邦法官也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人，而他们的任命过程也是高度政治化的。负有提名责任的总统和批准责任的参议院，都会选择和自身意识形态和司法理念相近的人选。因此，大法官虽然非经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但是往往体现出总统和参议院的意志，而间接地体现民意。而大法官在决策过程中，也受到民选机构和直接民意的双重

^① 例如，有学者指出，民主本身的概念包括但不止于多数统治的天然合理性，还应包括对少数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维护少数族裔权利（例如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司法审查事实上促进了民主的品质，防止了多数统治沦为“多数的暴政”。参见，钱锦宇，“司法审查的能与不能：从‘麦迪逊困境’的重新解读及其解决说起”，《环球法律评论》2007 年第 5 期；范进学，“美国宪法解释：‘麦迪逊两难’之消解”，《法律科学》，2006 年第 6 期。也有学者指出，司法审查应该发挥疏通民主程序的作用，保证公正合理的政治参与（*Baker v. Carr*）。参见，刘涛，“论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及其化解之路径”，《求索》，2013 年第 9 期。另外还有学者指出，“反多数难题”的前提就值得商榷，国会和总统并非代表绝对多数（majority），而只是相对多数（Plurality）。参见，任东来，“试论美国最高法院与司法审查”，《美国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② Daniel Farber, Suzanna Sherry, *Desperately Seeking Certainty: The Misguided Quest for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掣肘，加之大法官本身的意识形态也有可能随着民意的变化而调整，因此他们并非可以自由地挫败多数意志。最后，由于法院并不能自己执行自己的判决，因此，那些不受欢迎的、违反多数意志的判决，在执行过程中会被大打折扣，甚至被公然违抗^①。因此，至少从实证意义上说，司法审查制度的“反多数难题”并不存在。

二、多数主义的法官选任过程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虽然最高法院大法官无需通过选举产生，但是须由总统提名、并经过参议院批准，方得就职。而总统和参议院都是由选举产生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大法官的任命间接地体现了多数的意志。以联邦法官选任为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一过程充满了总统和参议院的博弈以及对候选人意识形态和判案记录的审查，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大法官是民选机关之间竞争和妥协的结果^②。

美国政治学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是最高法院实证研究的前驱。他于1957年发表的《民主国家中的决策：作为全国性政策制定者的最高法院》^③一文，广受引证，至今依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定着实证研究的思路和话语。达尔首先提出了“立法多数”（lawmaking majority）的概念，即联邦立法通过所仰赖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的多数，用以考查最高法院决策与多数意志的关系。限于当时民意调查技术的水平，达尔认为只能用这一概念作为“全国多数”（national majority）的替代品。显然，达尔终究还是希望将法院的决策与民众意志直接做比照，但是他的权宜之计却吸引了许多学者从政府机构间相互制约的角度来审视“反多数难题”。

达尔并不认为应该过分担心最高法院反多数的问题，法院几乎不会扮演“反多数”的角色。首先，美国的全国性政治一直以来为长期存在且相对统一的“统治联盟”所支配，而这一联盟长期作为“立法多数”存在。这一统治联盟长期支配政治有双重效果：第一，培养出一大批认同这一多数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政法精英；第二，有机会任命多位最高法院大法

① See Bradley Canon, Charles Johnson, *Judicial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98.

② See, e.g., David W. Rohde, Kenneth A. Shepsle, “Advising and Consenting in the 60-Vote Senate: Strategic Appointments to the Supreme Cour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3, 2007, pp. 664-677. Lee Epstein, Rene Lindstadt, Jeffrey A. Segal and Chad Westerl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Senate Voting on Supreme Court Nomine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8, No. 2, 2006, pp. 296-307.

③ Robert A. Dahl, *Decision-Making in a Democracy: 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maker*, 6 *Journal of Public Law*, 1957, pp. 279-295.

官。根据达尔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统计，平均每五位总统中就有一位可以在就职不到一年中任命一位大法官；超过一半的总统可以在两年内任命一位大法官；四分之三的总统可以在三年内任命一名。而总统显然会任命与自己所在统治联盟志同道合的政法精英，逐渐地，在一段意识形态、权力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最高法院中也会形成稳定的、统治联盟任命的法官的多数，从而保证了“法院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观点从来没有和美国立法多数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观点长期相左。”^①

达尔继续考察了历史上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的法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根据统治联盟的概念，他需要知道，最高法院是推翻了当下统治联盟的立法还是过往统治联盟的立法。他发现被宣布违宪的法律中只有一半是在通过的四年内被推翻的——即立法多数仍然存在。而在这一半的法律中，法院的决策并没有能够长久存在，即被国会推翻或者被法院自己推翻。法院所能够成功推翻的“多数”，一般只是不复存在的、昙花一现的多数，或者极为脆弱的多数；法院无力与稳定和坚定的多数实行长时间的有力对抗。总之，“立法多数一般都可以独行其是。”^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达尔的观点深受 20 世纪 50 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behaviorialism）学派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形成了所谓“态度模型”（attitudinal model）的一派。^③这一派别将行为主体——法官视为理性的政治参与者，而其理性（rationality）仅仅是其意识形态应用到个案中形成的态度。^④简言之，如果国会的某法律比法官 A 的意识形态要自由，那么法官 A 就会反对这项法律，并努力建立更加保守的新的政策目标。正如两位态度模型的重要学者指出的，“伦奎斯特之所以那样投票，是因为他极端保守；马歇尔之所以那样投票，是因为他极端自由。”^⑤达尔之所以认为法院不构成反多数的力量，就是因为总统和其所在的立法多数通过不断任命新的、与自己志同道合大法官，使得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在总体上与当

① Ibid., p. 285.

② Ibid., p. 291.

③ Lee Epstein, Jack Knight, Andrew D. Martin, “The Supreme Court as a Strategic National Policy Maker”, 50 *Emory L. J.* 583 2001, p. 587.

④ Jeffrey Segal 和 Harold Spaeth 在 2002 年出版的修订版中指出，他们已经借助理性选择理论对原有的态度模型进行了修正，他们不再认为态度是唯一的因素，但他们坚持是决定性因素。见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Attitudinal Model Revisit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⑤ Jeffrey A. Segal, Harold J. Spaeth,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Attitudinal Mod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5.

下的执政者一致。有学者将这种法院与立法多数一致的原因解释成“替换机制”（replacement mechanism）。^①

当然，达尔的立法多数概念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从 1968 年尼克松当选总统以后，国会两院、白宫分属不同政党的“分立政府”成为了常态，所谓“立法多数”已经很难确定。但是根据爱普斯坦（Lee Epstein）和西格尔（Jeffrey A. Segal）的研究，总统仍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任命与自己意识形态相近的法官。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被任命时与总统属相同政党的情况，占到了约 88%，而其他下级联邦法官的这一比例高达 92% 以上。^②而参议院在 82% 的情况下批准了总统的提名^③。究其原因，一方面总统在选拔候选人时，会考虑参议院的立场，避免选出立场极端者；另一方面，参议员也需要考虑总统提名人的民意支持率、意识形态等，避免危及自身的连选连任机会。当然，参议院也会有策略地行事。当总统提名人与自身理念严重相左，或者遭到了本州民意或者有关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时，参议员也不排除使用阻碍议事（filibuster）等手段，挫败总统意志。^④总而言之，联邦法官的选任过程是基于候选人意识形态、判案记录、党派性的政治博弈过程，其间，直接的民意测验和利益集团的活动也会发挥一定的影响。^⑤因此，虽然不经民众直接选举，联邦法官的选任制度并非是在民主的截然的对立面。相反地，有关各方均需要依策略行事，被成功任命的法官往往是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

三、有限度的独立决策：最高法院与民意

达尔虽然没有用民意和法院决策进行比较，但坦然是限于民调技术的落后和过往民意数据的缺乏。随着二战后民意测量工具的发展、民意数据的丰富，以及政治学实证研究中数学建模技术的提高，学者们开始有机会从更加根本的角度——使用民意的多数来衡量法院决策的“反多数”性。达尔自己也承认：“如果有人想要真正精确地了解这一问题，大概不证明

① Micheal W. Giles et al.,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Democracy: Unravel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Public Opinion and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0, No. 2, 2008, p. 293.

② Lee Epstein, Jeffrey A. Segal, *Advice and Consent: The Politics of Judicial Appointment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7.

③ Ibid., p. 99.

④ Ibid., p. 100.

⑤ Robert A. Carp, Ronald Stidham, *Judicial Process in America, Fif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1, p. 232.

某一法院决策与‘全国多数’的喜好是否一致是不可能的。”^①

一般认为，从历史上看，最高法院的决策与民意是基本一致的。^②但是，这样的一致性并不能说明民意与法官决策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美国司法政治学界（judicial politics）对民意与法院决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依然有很大的争论。^③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学界大致可以分为态度模型学派和策略行为（strategic behavior）学派。

坚持态度模型的西格尔（Jeffrey A. Segal）和斯皮斯（Harold J. Spaeth）认为，公众意见是不能够对法院决策发挥直接影响的；能够解释这种民意和法院决策趋同的只有达尔的“替换机制”，即大法官由民众选举的总统提名，并经民众选举的参议员确认，方可任职，因此，大法官间接地反映民意。^④因为态度模型认为，由于联邦法院在体制上相对独立，法官又是终身任职，因此，法官决策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是法官自身的态度，任何外部因素所起到的效果都微乎其微。^⑤

（一）直接联系假说：态度变化

在现实主义法学的启发下，不少学者提出了对态度模型的修正——即“态度变化假说”（attitudinal change hypothesis），用以说明民意对法官决策的直接影响。这一假说认为，虽然法官的决策动机依然以自身的态度为主，但是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法官在较长的任职期间，也经历了和多数民意相似的变化。正如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大法官指出的，“那些吞噬人民的大风大浪不会在遇到法官时，绕道而行。”^⑥这一假说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最高法院法官构成在进入较长的稳定时期以后，其决定依然与民用相协调的问题。

较早通过民意数据检视“反多数难题”的巴纳姆（David Barnum），通

① Dahl, p. 283.

② See David Barnum, “The Supreme Court and Public Opinion: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Post-New Deal Period,” 47 *Journal of Politics* 652 (1985); Thomas Marshal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 Longman, 1989.

③ See Kevin T. McGuire and James A. Stimson,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Revisited: New Evidence on Supreme Court Responsiveness to Public Prefere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4, Nov. 2004, pp. 1018-1035.

④ See Roy B. Flemming and B. Dan Wood, “Th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Individual Justice Responsiveness to American Policy Mood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2): 468-498., 1997. Richard Funston, “The Supreme Court and Critic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3): 795-811, 1975.

⑤ Jeffrey A. Segal, Harold J. Spaeth,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Attitudinal Model Revisit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25.

⑥ Benjamin Cardozo, *The Nature of Judicial Proce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1), pp. 167-168.

过研究新政以后的法院在公民权利方面的决策（避孕、废除种族隔离、堕胎、不同种族间通婚等）与民意的关系发现，反多数的问题是被夸大了。他的依据是法院的决策往往与民意的趋势相符。法院推翻联邦或州级立法时，可能是在回应现存的或新兴的多数民意。^①厄尔姆（Sydney Ulmer）也发现，布莱克（Hugo Black）大法官和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大法官的个人态度就在任职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②而且爱普斯坦等人在较新的研究中也表明，这种态度变化现象在法官中较为普遍。^③

米史勒和希恩（William Mishler & Reginald S. Sheehan）提出了和卡多佐观点类似的关于这种态度变化原因的解釋：“有些法官的态度偶尔有意或者无意地因公共情绪的长期变化或者这种变化背后的社会力量而改变。”^④弗莱明和伍德（Roy Flemming and B. Dan Wood）也指出，“社会人面临从美国文化、媒体和政治中产生的过量的刺激物。”^⑤

（二）直接联系假说：策略性行为

墨菲（Walter Murphy）于1964年出版《司法策略的要素》，较早地开始使用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策略性行为”（strategic behavior）路径考察联邦法官的决策动机。^⑥然而，正是马科斯（Brian Marks）的权力制衡博弈模型，才更好地解释了最高法院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即法院与联邦政府其他机关的关系。^⑦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需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就要依据个人的价值和目标，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评级，并且预测各

① David Barnum, “The Supreme Court and Public Opinion: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Post-New Deal Period,” 47 *Journal of Politics* 652 (1985), pp. 662-664.

② See S. Sydney Ulmer, “The Longitudinal Behavior of Hugo Lafayette Black: Parabolic Support for Civil Liberties, 1937-1971,”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1 (1): 131-153; “Parabolic Support of Civil Liberty Claims: The Case of William O. Douglas,” In *Courts, Law, and Judicial Process*, S. Sidney Ulmer,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 pp. 402-406.

③ Epstein, Lee, Valerie Hoekstra, Jeffrey A. Segal, & Harold J. Spaeth, “Do Political Preferences Chang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U.S. Supreme Court Justices,” *Journal of Politics* 60: 801-818. Epstein, Lee, Andrew D. Martin, Kevin M. Quinn & Jeffrey A. Segal, “Ideological Drift Among Supreme Court Justices: Who, When, and How Importa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01: 1483-1542.

④ William Mishler and Reginald S. Sheehan, “Public Opinion, the Attitudinal Model, and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Making: A Micro-Analy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litics*, 58 (1), p. 175, 1996.

⑤ Roy B. Flemming and B. Dan Wood, “Th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Individual Justice Responsiveness to American Policy Mood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2): 468-498., 1997, p. 471.

⑥ Walter Murphy, *Elements of Judicial Strate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⑦ Brian A. Marks, “A Model of Judicial Influence on Congressional Policymaking: *Grove City College v. Bell*,” working papers in Political Science, p-88-7,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8.

种备选方案的后果以及其他相关各方的反应，以确定最佳的行动方案。^①

虽然最早用于解释法院与其他政府分支的关系，策略性行为假说也被用来解释法院决策与民意的关系。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指出，“法院的权威——既不包括财权也没有军权——最终取决于公众持续不断的对其道德惩罚的信任。”^②法院的政策如果要得到落实，或者至少短期内不被推翻而成为法律，需要充分考虑其他政治分支的立场，而这些政治分支肯定是受到民意的直接限制的。如果法院的决定被推翻、或者难以落实，那么法官的政策目标就无法实现，法院的机构合法性（institutional legitimacy）和声望就会受到损害。正如这一假说的代表学者爱普斯坦所说的，“立宪者所建立的分权结构创造出机构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一关系使得法院很有可能作为游戏规则的保护者，而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反多数效果。”^③此一模型究竟如何解释法院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将在下文具体介绍。

（三）两种假说的争论与反多数难题

根据笔者观察，美国学术界对这两种假说的争论仍在持续，然而，笔者仍然比较倾向于认为，两种假设的机制可能是并存的，因为从概念上说，它们并不是完全互斥的：持续进行着策略性行为的法官也会在长期任职中经历态度和观点的变化。

在民意对最高法院影响的最新成果中，卡西拉斯（Christopher J. Casillas）等人区分了显著性案件和非显著性案件，认为民意仍然对法院的决策产生确切存在的限制力^④。卡西拉斯认为，法官始终处于策略性行为和实现自己原本态度的平衡之中。他们发现，法官的决策在显著案件中与民意偏离较大，而在数量占大多数的非显著性案件中和民意的同一性很高。虽然他们无法确定法官是否故意在非显著性案件中与民意保持一致，以便可以将积累的机构合法性和公信力（策略性行为假说占主要地位）用于政策影响力更大的显著性案件中，实现自己偏离民意的主张（即态度模型占主要地位），还是由于偏离了民意才更能吸引嗅觉灵敏的媒体注意，而造成

① See William Riker, “Political Science and Rational Choice”, in Jame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eds,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369 U.S. 186 (1962)

③ Lee Epstein, Jack Knight, Andrew D. Martin, p. 611.

④ Christopher J. Casillas, Peter K. Enns and Patrick C. Wohlfarth, “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 Supreme Cour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5, No.1 (2011 January), p. 75.

了案件的显著性。但是，他们认为至少在数量众多的非显著性案件中，法院的“反多数性”是几乎不存在的。^①

尽管两种假设都还无法被确切地验证，但是法院与民意在多数案件中趋同的事实是不争的。同时，也应指出，在符合民意程度上，最高法院不应与国会和总统适用同样的标准。即便是经民众定期选举产生的总统和国会议员，也不可能和多数民意完全符合，甚至不应事事唯民意是从。只要宪法不改变现行的最高法院组织办法，那么法官的独立性就是有宪法依据的。

四、有限度的独立决策：最高法院与民选机关

尽管达尔的这篇文章非常重要，但是其历史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达尔文章之后的 1972 到 2004 年间，平均每四年才有新的大法官上任，这一时期最高法院也经历了历史上时长第二的人员稳定期。^②人们不禁怀疑达尔所依靠的替换机制是否依然有效。1968 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国会两院和白宫长期分属不同的政党，美国政治进入了“分裂政府”的时代。达尔的论证所依据的“立法多数”概念已经难以确定。而分裂政府的时代，随着国会两院与总统间争端的激化，美国宪政体制中的权力制衡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在考察最高法院“反多数”问题时，新的研究路径开始出现，而这种路径就是前文提到的“策略性行为”模型。如果将国会两院、总统和最高法院视为处于博弈之中的竞争者，每一方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但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常常相左，而每一方的决定都依赖于另外几方才能得以实现，所以，每一方都必须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政策目标、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所有人所处的体制环境，从而做出策略性的决定。策略性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博弈各方的行为往往并不是自身原本的政策倾向或利益诉求。为了博得其余各方的合作，他们必须采取妥协或者迂回的办法。^③

因此，最高法院如果希望自身的判决得以成为持久有效的政策，那么它必须要考虑国会的立场和总统的立场。爱普斯坦和奈特 (Jack Knight) 在《法官做出的选择》一书通过对大法官备忘录、解密的内部会议记录等重

① Ibid., p. 86.

② Ibid.

③ See Nolan M. McCarty, *Political Gam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要文件进行了内容分析，展示出最高法院九人内部复杂而生动的策略性决策过程（书中最多使用的是 *bargain* 一词）。例如，作者对最高法院 1983 年任期中，小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 Jr.）大法官的会议备忘录，以及他和小鲍威尔（Lewis F. Powell, Jr.）大法官私下讨论的文本进行了编码。他们发现，在总共 155 个案件中，法官在 92 件（即 59.4%）的决策中考虑了其他政府分支的立场^①。而在 92 个案件中，法官更多地制成法解释（*statutory interpretation*）方面更多地考虑了其他分支的立场（69.8%）。原因是显然的，如果最高法院对制成法的解读与立法者的意见不一致，国会可以较为容易地通过新的立法来推翻法院的解释。而在宪法解释的案件中，国会面临的困难大得多，往往需要启动修宪程序、等待持不同意见的法官退休，或者强制通过与原立法相近的法律（但是这样做的压力和风险很大）。这就表明，法官行为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规范。他们很难为所欲为、置多数的意见于不顾。

“策略性行为”作为新的、用于解释法院与其他政治机构意见趋同现象的理论，与达尔的态度模型差异很大。它承认意识形态的同时，更加重视制度对于政治参与者决策的限制。简言之，法官必须受制于他人，那么他（她）的政策目标必然大打折扣。也就是说，策略性行为不仅考虑法官怎么想，更加关注他们怎么做。因此，即便将他推上高位的立法多数不复存在，法官依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下的立法多数，其反多数的潜能受到限制。

当然，策略性行为理论并不能保证法官会在所有决策上都会高度重视，并可以准确把握国会两院和总统的立场。事实上，有时候法官不追求更大程度上的自身政策目标的实现，他们可能愿意作为“异见者”（*dissenter*）。更多的时候，法官无法准确把握国会议员的全部立场。如果现实世界和模型一样理想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国会推翻法院裁决的现象出现了。^②同时也应指出的是，分权制衡策略模型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行政和立法机关主动邀请最高法院自由行使权力，以避免在选举中直面可能的敏感

① Lee Epstein, Jack Knight, *The Choices Justices Make*.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1998, p. 147.

②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在描绘法院内部决策过程方面，态度模型和理性选择模型孰优孰劣尚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权力相互制约视角下的策略性行为模型，对于消解“反多数难题”有更大的价值。

问题。^①

但是，分权制衡的体制保证了“法院不会总是明显地和其他政府分支脱节”。^②这一结论是由两方面制度性因素保证的。一方面，多数情况下，法院为了实现自身偏好的政策，会主动对其他政府分支的意见予以尊重，以防止“打击报复”。另一方面，国会和总统都有一定宪法赋予的反击法院的权力。当法院的决策超出了国会中位选民的无差别点时，国会就很有可能推翻或者修订法院的裁决。同时，宪法还规定国会拥有改变最高法院司法管辖权、甚至弹劾法官的权力。正如费希尔（Louis Fisher）所指出的，法院的裁决很少是最终的，它始终和其他部门处于“宪法性对话”（constitutional dialogues）之中。^③

五、空洞的希望：法院裁决的执行

“反多数难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即法院可以作为约束“多数暴政”的力量，维护暴政宪政体制中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说，人们无需担心所谓“反多数”的问题，因为最高法院存在的理由，就是以少数来限制多数，防止民主变成暴民的统治（mob rule）。“反多数”不是难题，而是立宪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规范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在宪政民主理论中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无疑加剧了“反多数难题”：法院何以判断多数的统治与多数的暴政呢？使民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运作，维护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实际上是法院无力承担的负担。这一点，在实证研究中变得尤为明显：法院很难单方面地限制多数的力量，促进公平正义和少数群体权益的真正有效力量，还是多数的立法和行政机关。

达尔在其 1957 年的文章中就较早地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他发现，总体上看，法院并不能用自己的政策代替立法多数的政策，而在少数法院确实试图取代多数政策的案件中，法院的动机也不是保护少数权利，因为几乎没有判决的依据是《权利法案》进行的。^④

① Mary L. Volcansek,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Judicial Impeachment”, in Colton Campbell and John Stack Jr. ed., *Congress Confronts the Court: The Struggle for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Lawmaking*.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p. 39.

② Dahl, p.592.

③ Louis Fisher, *Constitutional Dialogues: Interpretation as Political Proces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④ Dahl, p.292.

但是，由于达尔的文章写于以司法能动主义著称的沃伦法庭（Warren Court）之前，其结论也受到质疑，因为沃伦法庭似乎开启了最高法院崭新的历史，似乎成为了“权利革命”的领衔者。卡斯珀（Jonathan D. Casper）就指出，1958年到1974年间，除了俄勒冈苏米切尔案^①，所有28个司法审查推翻的立法，全部都是基于人权法案（尤其是第一和第五修正案）以及第十四修正案。^②

但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森博格（Gerald Rosenberg）在《空洞的希望》一书中，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便法院能够做出反多数的裁决，其裁决对多数的约束力有多大？裁决是否能够得以贯彻落实，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呢？^③显然，要实现某种政治目的，首先需要竭力保证政策的法律化（包括国会、总统的制成法和法院确立的司法解释），同时还需要政策可以得到落实，以期取得政治目标本身所期望的社会变革。

罗森博格指出，最高法院对社会的政策性影响有两种，一种是司法性的，一种是非司法性的。在司法性方面，法院的影响力应该体现在其判决的被执行情况；非司法方面，法院的影响力可以体现在其判决对社会成员的教育、说服和激励上，体现在其对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

罗森伯格认为，评价法院这两方面影响的模型有两种：受制法院观（constrained court view）和动力法院观（dynamic court view）。前者认为，法院受到宪法对于权利的规定、其他政府部门的影响和执行效力弱这三方面限制。而后者则认为，法院具有政治的、制度的和经济的独立性，还可以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大催化剂。综合这两种观点的优点和不足，罗森博格认为法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变革：一，其他政治参与者愿意服从法院的裁决；二，法院的裁决可以在现行体制内得以有效执行；三，有足够的原本沉默的政治参与者支持法院的决策，借助法院判决推行自身本来就倾向的改革举措。笔者认为，这三个条件指向了同一个结论：美国社会变革的真正力量依然主要地掌握在多数手中。

通过将理论建构应用于民权、妇女权益（包括堕胎权）以及环境保护、重新分配席位和刑法等方面社会进步的因果分析，罗森博格认为法院的作用往往是被夸大的，某些社会进步的根源也许来源于法院的判决，但是推

① Oregon v. Mitchell, 400 U.S. 112 (1970)

② Jonathan D. Casper, “The Supreme Court and National Policy Makin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0, Issue 1, 1976, p. 53.

③ Gerald N. 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动政策改变的直接力量仍然是多数。例如，数据表明，布朗案以后，南方学校的隔离废止比率几乎没有变化，真正显著的变化还是发生在 1964 年民权法案通过以后^①。再例如，布朗案以后，媒体（当时主要是报纸）对于民权事务的报道数量和角度并没有明显改变，而正是 60 年代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尤其是伯明翰的暴力事件使得媒体和公众对于民权运动的态度开始发生积极的改变。^②克莱曼（Michael J. Klarman）、沃尔特斯（Raymond Wolters）等学者甚至认为，布朗案对于民权运动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帮了倒忙，促使南方白人的“对抗性反应”（backlash）。^③

可见，法院本身作为一个非多数的政府分支，其实现理想的社会变革的力量依赖于多数机关和民众的配合，法院并没有实力实行单边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即便可以“反多数”，也不能称其为“难题”，因为既没有钱袋子的，也没有枪杆子的法院，依然是“危险最小的部门”。

六、结语和思考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了司法审查制度，这可以说是美国宪政最大的贡献。但是美国人自己却最为这一制度的民主性感到担忧，不得不令人感慨。根据纽约大学弗里德曼（Barry Friedman）的分析，对于最高法院民主性的担忧，究其根本，来源于美国建政以来司法权力的增长和最高法院组织方法的弱民主性。更多的权力被一个不需要定期向选民负责的机关掌握时，焦虑是合理的。^④事实上，貌似权力不断增强的最高法院并没有对美国民主造成根本性威胁，相反，民众对最高法院的看法一直是好于总统和国会的。

然而，国内学界依然从政治哲学、法理学的角度，进行规范性研究，在普遍否认存在“反多数难题”时，不慎陷入了“规范性难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借助美国司法政治实证研究产生的丰富成果重新审视这一难题。这也是本文所要达到的目的。最高法院的实证研究，归根结底是围绕司法权力的真实情况展开的。而正如罗森博格指出

① Ibid., p.51.

② Ibid., p.117.

③ Michael J. Klarman, “Brown, Racial Change,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80, No. 1, Feb. 1994. Raymond Wolters, *The Burden of Brown Thirty Years of School Desegregation*.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4.

④ Barry Friedma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part I): The Road to Judicial Supremacy, 73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333 (1998).

的，“由于权力关系的有无只能在实践中被检验，那么所谓司法审查的说法只能通过经验的验证。”^①研究表明，虽然理论上法官可以自主行使权力，但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机制设计会使法官的权力受到众多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限制。最高法院权力的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制宪者所预期的“最小危险部门”的地位，推动美国社会变革的真正力量仍然主要地掌握在多数机关手中。

今后一段时间，实证研究可能会继续致力于寻找民意对法官决策限制的确切机制，脱离目前所处的假说阶段。但也应该指出，司法权本质上与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同，民主主义浪潮是否应该使得最高法院也和其他分支一样，受到民意的定期检测并与之保持高度一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实证研究者虽然避免卷入规范性问题的怪圈，但是显然都是基于同样一个价值判断的：越民主的法院越好。而这本来就是值得商榷的。尤其是考虑到这一价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带着这样的价值判断进行的实证研究，是否会成为对民主性片面追求的偏执，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也是有待进一步观察的问题。

总而言之，“反多数难题”之困，在于抽象地审视宪法解释权和司法权本身，是孤立和静止地看问题导致的迷思（myth）。沃伦法庭的积极能动，也加剧了人们对于司法权力的恐惧。实证研究则发现，沃伦法庭的所谓“帝王司法”本身就是一个迷思，^②更不要说多数情况下相对节制的最高法院了。司法权内嵌在美国三权分立与制衡中，也受到媒体和民意从不间断的拷问和监督，很难构成“反多数”的力量。^③

（责任编辑：夏真真、刘畅）

① Gerald N. Rosenberg,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the Re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4, Issue 03 (1992 Summer), p. 370.

② See Mark Kozlowski, *The Myth of The Imperial Judiciary: Why the Right is Wrong about the Cour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 笔者和美国实证研究学者普遍采取概率性的观点，而非决定论。虽然说“反多数难题”很难出现，美国历史上也不乏最高法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例子。但是，正是实证研究证明的各方面因素使得即便出现这样的难题，法院自身、政府其他机关和民众都完全有能力对法院实施制约。可参考 Tom Clark, *The Limits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美国对“藏独”组织的民主援助

——以国家民主基金会在西藏的活动为例

张莹*

【摘要】本文以国家民主基金会对“藏独”势力的支持为例，探讨了美国对“藏族独立”势力民主援助的方式、特点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国家民主基金会以民主人权为借口，主要通过向西藏提供经济援助，声援网络、西藏评论、西藏九·十·三运动等组织，在西藏地区宣扬美国的意识形态。该组织对西藏的援助项目涵盖了教育、司法、文化、经济、人权等多个领域。此外，它还向西藏的分裂势力提供资金赠款，帮助他们培训政治精英，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结合该组织近年来在西藏地区的活动情况，本文总结出美国“藏独”分子的民主援助具有善于利用媒体与公众的力量、以促进人权为借口、善于塑造精神领袖的特点。针对美国的对藏策略和活动方式，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做好以下工作：首先，政府应加强立法，使反分裂制度化；其次，应拓宽对西藏问题的对外宣传渠道；最后，要重视民间力量的作用，扶持对华有利的涉藏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研究机构的发展。

【关键词】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援助；“藏独”组织

民主援助是一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类型之一，它属于政治援助的范畴。美国的民主援助是其对外输出民主的重要战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设立于里根政府时期，该基金会是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其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国会拨款，与国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美国对外实行公开的民主援助的工具。该基金会近年来在西藏地区活动频繁，支持藏族分裂势力的发展，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对此，我们要予以重视，提高警惕。

一、政治学理论中的民主援助

民主援助是一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类型之一，它属于政治援助的范畴。

* 张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美国的民主援助是其对外输出民主的重要部分。美国笃信本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试图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思想观念与政治制度，通过经济帮扶，资金支持和人员输出来影响其他国家，援助的对象既包括了传统的主权国家，也包括受援国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并将这种援助与该地的民主化发展相挂钩，影响受援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卡特政府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就曾经发表声明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是正如总统所强调的，任何一个联合国成员国都不能声明侵犯受到国际保护的人权仅仅是其自己的事务。我们的目的是制定同我们的信仰一致的政策，并且当我们认为合乎需要时心平气和地和不带歉意地声明这些政策。”^①

针对对外援助的目的这一问题，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国家利益是一切国家行为的出发点，一国的利益所在决定了该国实施对外援助的目标与对象。摩根索曾说：无论什么样的对外援助，其本质都是政治性的，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除此之外，在对外援助的旗帜下并没有更高的道德原则。华尔兹认为，对外援助就是霸权工具，与行贿没有本质差异。

民主和平论的代表认为，民主援助能够增加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民主国家更倾向于采用和平方式而非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际冲突。“美国应该在世界迈向民主的进程中担当起领导角色，民主政府更爱好和平，很少发动战争或者引发暴力。那些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不可能与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战争，也更愿意支持对武器贸易的限制，鼓励和平解决纠纷，促进自由贸易。这样，当一个民族试图举行自由选举和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时，美国和国际社会不仅应该帮助，而且应该保证这一结果。”^②

美国民主援助的范围既包括对美国友好的国家中的政党和组织，也包括与美国敌对的国家内的政党和组织。其援助的手段主要是为国外政党、民间组织、政府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设备供给、人员培训等。“民主援助”不仅体现了美国政治家对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笃信，而且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民主援助”也是美国政府运用其软实力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

二、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设置

①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② Morton Halperin, “Guaranteeing Democracy,” *Foreign Policy*, No.91,(Summer, 1993), p.105.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设立于里根政府时期，是美国对外实行民主援助的工具之一。1982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时声称美国的外交目标是十分单纯的：“培养民主的基础，这一体系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工会、政党、大学…现在正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包括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投身于援助民主运动的时候。”^①在冷战初期，中央情报局通过暗地里向民间志愿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的方式向铁幕以外的东欧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在60年代，这一行为被社会主义国家披露，遭到强烈抗议。因此，美国部分议员建议以设立公开组织的方式来传播其民主价值。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建立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提案，制订了《国家民主基金会条例》。这一组织的设立是美国对外民主援助制度化的重要体现。美国学者威廉·布鲁姆在谈到这一组织时说“全国民主基金会将公开去做那些过去几十年来中央情报局一直秘密去做的事情，以便洗去与中央情报局联系在一起的恶名。”^②

民主基金会认为：自由是全人类的渴望，它可通过发展民主制度、程序及价值而得以实现。民主不会通过一次选举就能得到实现，也不必以美国民主模式或任何其他特点国家为基础。相反，民主应与多样政治文化的需求及传统相适应。通过对民主进程的支持，民主基金会帮助增强国外本土化的民主运动与美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而这一联系是基于将代议制政府与自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同信念。^③根据《国家民主基金会条例》规定，该基金会的主要职能有：发挥美国民间机构的作用，促进其与海外民主组织的交流；推动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美国工会、商会、两党机构）参与国外民主制度建设，宣传自由选举思想，邀请国外政治精英参加培训；在海外传播民主与自由意识，扩大当地公民社会网络，使当地政治文化与美国趋同。

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具有强烈的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它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国会拨款。基金会现由理事会管理，理事会成员大多数曾任国会议员、参议员、或驻外大使，现任总裁卡尔·杰希曼还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资深顾问。在基金会的执行机构中设立有国会联络员一职，其余职

① Ronald Reagan, "Address to Member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June 8, 1982," 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 July, 1982, pp.24 ~ 29.

② William Blum, *Rogue State: 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Monroe: Common Courage Press, 2000), p.179.

③ 陈向阳：《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6期，第18页。

位按照地区划分，包括非洲部主任、亚洲高级计划主管、欧洲与欧亚中心主任、中亚与高加索计划主管、中东与北朝鲜高级计划主管等。

国家民主基金组织的受赠者主要是该组织的四大核心机构：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协会、国际共和党协会、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它们分别属于民主党、共和党、劳联-产联以及美国商会。上述核心机构独立运作，涵盖了美国的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涵盖了各个阶层，包括企业界与工人阶层，其工作的侧重点不同。两党协会致力于推动具有相似执政理念的政党发展与壮大，宣传建立选举制度，影响该国政治道路的走向。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负责拓展当地的工会组织，推动当地公民社会的形成。国际私营企业中心信奉市场经济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因此鼓励推动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

上述四大机构所得到的拨款一般都占总额的一半以上，其余的款项将划分给国外的非政府组织或政党，如《民主杂志》、国际媒体援助中心、世界民主运动等。9·11 事件之后，美国更加坚信只有通过传播民主自由的思想观念，彻底变革中东地区的政治体制才能消除恐怖主义，实现本土的安全。近年来，该基金会对外资助的款项达 1200 项，遍及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开展的项目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中东欧的一些转型国家，主要的目的是巩固民主；另一种是针对所谓的集权政体国家，目的是推广人权，建立民主制度。其中对中国的项目包括了对“疆独”、“藏独”、香港反华势力的资助。

三、国家民主基金会在西藏的活动

西藏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地理位置上来讲，西藏与尼泊尔、缅甸、不丹多国接壤，是我国大西南边疆的重要屏障。由于气候、资源、历史原因等的相互作用，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宗教差异再加上经济水平发展的差异，使得西方国家屡次用西藏问题抹黑中国，并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涉藏问题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国际关注度，与美国大量的涉藏非政府组织密不可分。民主基金会就是这些涉藏非政府中的一员，他们为西藏流亡政府提供资金支持，训练武装人员，鼓动民族分裂分子参与暴力武装叛乱。

该基金会的赠款需要由相应的组织团体提交申请，申请书中要包括项目实施的社会背景、项目负责人、执行目的、实施办法、项目活动、评估

计划等内容，不受理个人申请，也不会与受援国的政府合作。为了对资金做出安排，基金会每年召开四次理事会季度会议，决定申请书提交之后，董事会将权衡项目的可行性、重要性、紧迫性进行整体评估决定赠款金额。申请资金支持的项目一定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申请能否成功的前提。项目开始运行后，基金会会组织专门的小组，以追踪实施报告、实地考察或者其他方式监督项目的执行。

从图表1可以看出，国家民主基金会在1990到2008年期间援助的涉藏组织达24个，援助总额达三百万多美元。在这19年期间，它不断地增大对中国地区的捐助，而且西藏地区在对中国援助的总额里所占的比重呈明显增加趋势。尤其在2008年，在3·14西藏暴力事件的背后便可以看到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影子。在事发前的半个月，该基金会同意了西藏流亡政府提交的“九·十·三运动”资金的紧急申请。而在更早的2007年，该组织对西藏的援助总额和项目数都达到了这些年以来的峰值，这无疑也为2008年西藏地区的骚乱提供了部分资金上的援助。

表1：国家民主基金会1990-2008年用于中国、西藏的赠款额，在西藏的项目数量

| 年份 | 中国 | 西藏 | 在西藏的项目数量 |
|------|----------|---------|----------|
| 1990 | 376,750 | 46,500 | 2 |
| 1991 | 564,537 | 47,175 | 2 |
| 1992 | 753,380 | 93,675 | 2 |
| 1993 | 137,4366 | 24,250 | 1 |
| 1994 | 1628,842 | 60,520 | 2 |
| 1995 | 1906,516 | 63,950 | 2 |
| 1996 | 2507,450 | 55,500 | 2 |
| 1997 | 1574,804 | 30,516 | 1 |
| 1998 | 2387,758 | 191,710 | 4 |
| 1999 | 1786,833 | 110,000 | 5 |
| 2000 | 2566,632 | 100,000 | 4 |
| 2001 | 2991,418 | 202,900 | 7 |
| 2002 | 3129,148 | 252,618 | 8 |
| 2003 | 3413,163 | 330,865 | 10 |

| | | | |
|------|----------|---------|----|
| 2004 | 4390,922 | 230,000 | 7 |
| 2005 | 4447,983 | 251,225 | 9 |
| 2006 | 5671,565 | 293,000 | 11 |
| 2007 | 6110,531 | 444,710 | 14 |
| 2008 | 6044,077 | 351,930 | 11 |

资料来源：图表表根据国家基金组织网站的数据整理得来。网址：<http://www.ned.org/>

根据美国民主基金会官方网站上的资料，在西藏地区设立的项目主要有：鲍德凯翻译与研究所（Bodkyi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House），主要目的是为藏族佛教人士提供少数民族法律的培训，山姆德珀咨询公司（Consultations Samdup），主要目的是为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对话创造条件。西藏九·十·三运动（Gu-Chu-Sum Movement of Tibet），主要目的在于声援释放西藏当前以及过去的政治犯，为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负责西藏地区民主网络的构建，通过创建中文网站的方式向中国传达西藏地区的民主情况，促进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官员、学术界的交流和理解。这些组织是西藏流亡政府中活动频繁、影响较大的组织，以2013年度为例，各组织得到的赠款详情见下表：

表 2：国家民主基金会 2013 年度对西藏各组织援助的数目

| 受援机构 | 援助金额 |
|------------|--------|
| 西藏声援网络 | 50,000 |
| 社会与资源发展基金 | 40,000 |
| 西藏扫盲社 | 40,000 |
| 山姆德珀咨询公司 | 37,000 |
| 哈瓦卡坡西藏文化中心 | 35,000 |
| 西藏之声 | 34,000 |
| 西藏九·十·三运动 | 30,000 |
| 鲍德凯翻译与研究所 | 25,000 |

| | |
|-------------|--------|
|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 25,000 |
|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 | 25,000 |
| 西藏妇女协会 | 25,000 |
| 西藏司法中心 | 15,000 |
|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 18,000 |

资料来源：该图标根据国家基金组织网站 2013 年度开支整理得来。网址：

<http://www.ned.org/>

从以上两个图表可以看出，国家民主基金会对西藏的援助项目涵盖了教育、司法、文化、经济、人权等多个领域，波及的人群广泛，具有种类多样化，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入等特点。



四、美国对“藏独”组织“民主援助”的特点

国家民主基金会对“藏独”组织的援助项目涵盖了教育、司法、文化、经济、人权等多个领域，具有种类多样化，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入的特点。该基金会对“藏独”组织的民主援助是美国整体战略的一个缩影。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藏独”组织的民主援助具有以下特点：

（一）、善于利用媒体与公众的力量

从国家民主基金会2013年在西藏的援助项表中可以看出，该组织通过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以及西藏之声提供资金支持，向西藏地区的群众进行

广播宣传,让他们在条件落后的情况下也能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此类的报道。对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扫盲协会的资助为流亡政府提供了人才支持。

此外,该基金会重视民间交流,学术界交流的作用,经常开展扶贫教育,民主教育,民主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组织学术研讨会,邀请民主人士、学者专家前来,就西藏发展问题发表看法。有时甚至邀请藏独头目或者活跃人士去美国演说,诋毁中国政府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另外,它还为藏族学生提供奖学金,而得到资助的学生反过来要在学业有成之后为流亡政府服务。媒体和公众对西藏地区的宣传和交流成为国外民众了解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对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假借人权与民主的外衣

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在民主援助的外衣下开展各种活动的,以人权为借口,谴责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该基金会名义上宣扬要实现西藏地区的民主化,实质上只是在利用达赖集团,“藏独”组织成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渗透工具。

美国每年发表西藏人权情况调查报告,借西藏人权问题抹黑中国的民族政策,试图将国际舆论拉向达赖集团。另外,该基金会还设立了民主服务奖章,颁发给那些为美国民主做出贡献的人。波兰总统瓦文萨是首次得到此奖项的外国人,2010年,该奖被颁发给西藏流亡政府的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三）、在“藏独”分子中树立民主榜样

达赖喇嘛以及“疆独”头目热比娅都被西方美化,美国人把他们塑造成民主的代言人。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西藏问题得到国际关注。在此之后,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喇嘛国会金奖,民主基金会随后颁给他“民主服务奖章”。在其主办以及帮办的一些民主杂志里,不断地刊登藏独头目在推动西藏分裂方面的事迹,美化西藏流亡政府,目的是利用领袖的魅力吸引更多的追随者。

五、中国的对策

国家民主基金组织所从事的活动显然已经威胁到了我国的国家安全,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传播美国的民主价值、意识形态。现在不断地有学者质疑美国在海外推动民主化的行为,认为美国在其他国家推行美国的政治价值观,或者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做法忽视

了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划线。^①那么，中国政府应该如何面对美国对民族分裂分子的支持呢？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症下药。首先，中国的立法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反分裂行为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其次，应该扩大专项拨款加强对西藏真实情况的对外宣传；最后，我们应该重视民间的力量，鼓励对华有利的涉藏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

（一）、增加反分裂的相关立法

首先，使反分裂制度化。针对西藏问题，美国国会制定了专门的国会法案。中国也应制定专门的法律，2005年，为了反对和遏制台湾分裂势力，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反对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同理，全国人大应该制定出专门的法律来反对国外组织与国内分裂分子的分裂行为。这需要中央政府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通力合作，增强对非政府组织的审查与监管，对确实能促进西藏发展的NGO予以鼓励和帮助，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一经发现任何组织有危害我国民族团结，变相地帮助分裂分子的行为，就要制止其在中国境内的一切活动，取消其合法资格并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

此外，中国政府可以设立主管西藏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官员，使这一地区民间组织的管理法制化，制度化。

（二）、多途径强化对西藏问题的正面宣传

加强和改善中国涉藏问题的对外宣传。首先要改善我们的宣传方式，传统的平面传媒具有覆盖率低等缺陷，中国要使对外宣传方式多样化，应利用好国际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体，建立全面的国际网络。运用汉语、藏语、英语甚至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面向国际社会展现西藏地区近年来巨大的变化，还可以通过拍摄纪录片、卡通片、电影等方式形象地向国外藏民同胞，国际组织传播当前西藏的发展事实。

其次，要重视网络传媒的作用。网络媒介具有速度快、信息量大的特点。我们应该借助网络传媒的作用，建立专门的网站定期报道西藏的人权状况和经济状况。西藏人权网便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而且开通了英语、德语和法语版本，有助于信息的国际传播。^②

最后，要重视外交工作在西藏对外宣传中的作用，各国使领馆在驻在

① 刘国柱：《当代美国“民主援助”解析》，《美国研究》，2010年第3期，第7页。

② 西藏人权网，<http://www.tibet.328.cn/>（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5月13日）。

国肩负着提高国家形象的责任。因此各国使领馆可以通过开展西藏日，西藏文化周的形式邀请驻在国的民众来使馆参观。同时，西藏的某些城市可以与国外的城市结为友谊城市，互助城市，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西藏地区当前的发展。

（三）、重视民间力量的宣传作用

要重视民间力量的作用，加强民间学术机构的交流。可以在民间设立藏学研究中心等学术型机构，而这些机构可以设立专门的网站，组织学术研讨会，加深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另外，还可以增大资金援助，支持对华有利的涉藏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首先，要加强民间学术机构的建设。当前世界上存在很多藏学研究机构，有很多优秀的藏学专家。但是由于达赖集团在世界上藏学研究中的影响巨大，因此很多藏学专家对西藏的主权归属、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统治政策持有负面的态度。我们应该鼓励在高校内建立藏学研究中心，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培养有国际影响力的藏学家，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接受，通过学术界的声音宣传西藏的民生民情。目前，中国设有藏学研究中心的大学寥寥可数，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而美国的藏学研究则是很多大学里的重要部分，与院校同步发展，有的院系还把藏学设为必修课。高等院校在传播藏学等方面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今后仍是藏学教学研究的主要基地。^①

除此之外，中国也应积极的支持对华有利的涉藏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作为当前全球治理中新兴的角色，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很多国际事务里，它都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其中。尽管非政府组织具有非营利性，资金来源于民间，但是政府依然可以给予财政补贴。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扶持反分裂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支持他们从事宣传民族团结的活动，宣传中国政府的正面形象。此外，政府可以向这些组织提供财政拨款，鼓励他们开展有关藏族文化，西藏地区发展的学术研讨会，甚至与美国的相关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交流关系，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六、结论

本文梳理了政治学中的一些民主援理论，介绍了国家民主基金会以

^① 索珍：《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与藏学人权研究现状及其分析》，《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

及近年来它在西藏问题上的有关活动，以这一组织为例分析了美国对“藏独”组织的民主援助特点，针对政府的应对策略提出了建议措施。国家民主基金会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公开为西藏分裂分子提供支持，通过资金援助、人员培训等方式鼓动西藏流亡政府以暴力形式对抗中国政府。从该基金会1990年至2008年的项目援助可以看出国家民主基金会在西藏地区的援助项目涵盖了教育、司法、文化、经济、人权等多个领域，具有种类多样化，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入的特点。

国家民主基金会实质是美国对外实行公开的民主援助的工具。从该组织设立的项目以及从事的活动中，我们又可以把握美国对“藏独”组织民主援助的过程中的特点，即善于利用媒体和公众的力量，以民主人权为幌子，善于塑造精神领袖等特点。

该基金会近年来在西藏活动频繁，提供资金支持藏族分裂势力的发展，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针对以上情况，本文又为中国政府提出了应对政策。首先，政府应加强立法，使反分裂制度化；其次，应拓宽对西藏问题的对外宣传渠道；最后，要重视民间力量的作用，扶持民间研究机构和对华有利的涉藏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要综合利用各方的力量，捍卫国家利益。



（责任编辑：夏真真）

政党轮替——台湾篇



【编者按】2016年1月16日台湾“大选”落幕，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高票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经历了惨败，不仅输掉了“总统”选举，在立法委员选举中也吞下苦果，选后党内掀起了一片检讨之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选举中，“时代力量”作为新的政治势力在选举中表现不俗，拿下5个立法委员席位，顺利组成党团而成为国、民两党外的第三大党。由于民进党掌握了立法机构的多数，蔡英文在未来四年可以“完全执政”，而“台独”倾向强烈的“时代力量”所实现的突破，标志着台湾的世代交替在政治上开始产生效应。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发展和两岸关系的走向可能会随着新的政治格局而发生变化。本期《闻道》开辟“政党轮替——台湾篇”专题，聚焦在台湾世代交替的政治环境下，国、民两党该如何自处。

国民党闹够了，也该做事了

王晓笛*

吵吵嚷嚷的“换柱”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在 17 日的国民党临全会上，812 名（出席 891 人）党代表同意了“废柱提案”，近乎于全体的共识。洪秀柱的离开已成定局，但至少曾一度令人忧虑的退场问题得到了体面地处理。纵然背影落寞，但洪却留下了“孤臣可弃，但绝不折节”的慷慨演说，感动了无数支持与非支持者，个人声望也再攀高峰。

理性上讲，“柱下朱上”的结果早已在预料之中，但在情感上，恐怕还是令相当多的人感到惋惜和遗憾。几个月前，当洪秀柱以史上最高民调通过“防砖机制”时，蓝营中下层人士都认为，这位别具一格的“小辣椒”，将会一扫国民党的陈腐与颓靡，给 2016 年带来希望。然而事与愿违，在有迹象表明洪秀柱的竞选将冲击“立法委员”的选情时，曾经对选举推三阻四，不愿出头的党内大佬们，立刻以“救党”为名团结在一起，在“换柱”事情上出奇的齐心。

然而尴尬的地方在于，国民党将要为此付出道德上的代价，即使手头的道德筹码本就已经所剩无几。在美国，总统候选人一旦获得党内提名，即使民调再低，也没有出现被撤换的情况，这反映了美国人对制度的尊重。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价值，需要物质条件上的维护与体现，也就是程序上的正义。当国民党煞费苦心地在程序上名正言顺地废止洪秀柱时，已经给社会留下了手段低劣的观感，即使有千般理由，在他人看来也不过是在为自己辩解。

国民党不会不懂这其中的道理。但在这样进退维谷的窘迫中，依然选择孤注一掷，只能说国民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压力。从内部来讲，主要到涉及“立法委员”的选举，这关乎国民党的身家性命，倘若民进党一举在“立法院”拿下多数席位，将会就各种问题，特别是“党产”问题向国民党发难。一个群体的组成，最重要的是有可以凝聚这个群体认同的共识和价值。作为“百年老店”，国民党其实占有着相当丰富的理念资源。但可悲的是，百年以来，国民党并未完成组织化的建设，多中心的内部结构导

* 王晓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致的结果，是一旦领袖或强人撒手人寰，便立刻一盘散沙。国民党内当然不乏坚守信仰的人士，但在台湾民主化后因理念不合纷纷出走，另起炉灶，亲民党、新党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不客气地讲，现在的国民党山头林立，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无论是派系还是个人，随时可以甩袖不干。国民党引以为傲的理念不过是一身华丽的装扮，钱才是维系党内共识的重要工具，如果命根被人连根拔起，国民党搞不好也要随着土崩瓦解，作鸟兽散。百年基业断不可毁，换柱，的确有其紧迫性和必须性，无论对选情有何影响，至少可以安抚各派对选情低迷的不满，先延缓国民党的崩溃。

此外影影绰绰的美国因素，也是国民党痛下杀手的重要原因。早先朱立伦建议洪秀柱访美，美国也有意接触这位国民党的候选人。但洪拒绝出访，并对美态度轻忽，多少让美国有所不满。在随后的接触中，洪秀柱未能向美国就自己的两岸政策做出足够的说明，美国对“一中同表”隐约透露的“急统”色彩感到忧虑。美国在台海的政策的一个基准，是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一中同表”的变动性高于已成为两岸基础的“九二共识”，而国民党输掉“立法院”，也难保民进党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无论如何，让洪来选“总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的推力是促成换柱成型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原因。

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洪秀柱得不到党内对她参选的共识，更奢谈全面的竞选资源支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朱立伦也是各方利益博弈妥协的受害者，现在的朱立伦，表面上是各派系的共主，其实就是个充门面的盟主。做事做不动，做坏要负责，在换柱后，又要背负骂名跳火坑，处境上和赚尽声誉、抽身退场的洪秀柱成鲜明反差。

现在一个普遍的认知是，即便是朱立伦也无法实现国民党在选举中的逆转，但换个角度想想，几个月来关于“换柱”的喋喋不惜已经尘埃落定，至少国民党不会再有什么借口，去给朱立伦使什么绊子，全力以赴可以缩小一些差距，这对选举而言多少是一件好事。朱立伦下面要做的，就是安抚挺柱团体的情绪，将蓝营的选票尽可能多的往自己身上揽。朱在临全会上呼吁“民主制衡”，在民进党强势回归的当口强调不要出现一党独大，是在大义上说服受伤的蓝营群众振作，同时争取一部分的中间选民。

此外，朱的上台，多少可以恢复国民党在两岸论述上的优势。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虽然屡遭多方质疑，却依然不影响她在民调上的遥遥领先，从某种程度讲，是由于“维持现状”宏大的想象空间满足了社会各方面的

预期，各族群都觉得这是自己所理解的现状，对蔡英文有期待，有所求。类似的政策模糊是选举当中常见的一种手法，选举人提出一个大方向，但不给出具体内容。言多必失，太过明晰的政策往往会被别有用心者抓到把柄，国民党对洪秀柱的担忧，也在于“一中同表”相较“九二共识”，变通性较低，主张“九二共识”，“一中”部分大陆可以接受，“各表”部分台湾勉强也可以接受，至少现在“九二共识”已经被构建成维持现状的必要原则，质疑声远小于“一中同表”，此前洪秀柱受党内压力将两岸论述转变为“一个共识，三个内涵”，在口号上给“九二共识”留出空间，也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其实在九合一选举后，民进党在地方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从年初的郑文灿在火灾中的打卡事件，再到最近赖清德的在登革热疫情中的处置不当、口无遮拦的台独言论.....如果能充分利用对手的失误，在这些地方的“立委”选举，国民党未必没有机会。在抓住对手失误的同时，国民党也要妥善解决宋楚瑜的分票，提防绿营在新北市问题上对朱立伦的发难，特别需要解决的，是在换柱风波后，民众形成的逆反心理。总而言之，从这一刻起，国民党的选战正式开始，留给国民党的时间不多，但也不少，认真经营，未必会有太坏的结果。



（责任编辑：王志浩）

诈骗集团国家

陈斯俊*

如果说 IS（伊斯兰国）是由一群高度组织化的恐怖分子所建立的“国家”，那么台独份子所鼓吹建立的“台湾国”就是一群诈骗集团所捏造出来，用来骗取钱财和名声的“投资项目”，而他们这二十多年来所骗取的利润可不是那些靠电话或社群网络诈骗所能比拟的。

在这世上除了华尔街金融集团，大概还没有像台独诈骗集团一样“投资报酬率”如此高且受到客户高度信任（不管是沉迷于他们给予的愿景，还是单纯看中他们骗钱的能力）的团队。台独诈骗集团的概念有点类似庞氏骗局，但手法更加复杂。庞氏骗局意指成立空壳公司诱骗人们投资，保证投资者短期内获得高回报使更多人上当，但其实不过只是把新投资者的钱支付给最初投资的人当作回报，直到再也付不出钱为止。

台独诈骗集团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们不需要以物质回报来维持信用，而是以幻想出来的愿景与未来收益作为抵押。台独诈骗集团中的中流砥柱是台独企业，这些企业与一般台商和被视为“统派”企业的不同点是他们更擅于隐藏自己的身分，他们不像富士康或旺报等企业高调，也不会以自己母公司的名义亲自去内地投资，而是用各种不起眼的子公司来挹注资金参与房地产等投资项目，或是与内地的民营企业开展合作以避人耳目，例如知名独立影片网站爱奇艺，曾引进独派媒体三立电视台包括偶像剧在内的大量节目（目前已全数下架）。

他们在内地赚取大量收益，回到台湾后除了继续投资房市股市外，其余用来投资政界与媒体，在台湾选举是个高收益却也是高成本的投资，可以说没有企业提供的政治献金是几乎无法进行，然而一旦打赢选战，其背后的利益也是非常可观，藉由地方政府公开招标、采购、产商回扣、影响政策、推动减税等方式就能在短期内回收成本。战国策上记载道，“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不韦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饱食；今定国立君，泽可遗后世，愿往事之。’”，政商关系打好，即便这些企业老板都没有成为“宰相”的机会，留下的资产也足够养好几代纨绔子弟了（更不用说遗产税最高税率已调降至 10%）。

独派媒体以自由时报、三立电视和民视为三大支柱，其政治新闻攻击对象以蓝营与统派为主，政论节目的主题也常出现“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论调，言词极尽挖苦、激进与低俗。我将这些企业的目的归

* 陈斯俊，台湾彰化人，台湾政治大学地政学系毕业生。

纳为三项，其中第一个目的就如上述所说，无非是吸引观众目光并攻击对手，在选举时期帮赞助对象拉选票以获取更多利益。

独派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另一个方法，是刻意捏造一些“宫斗”剧情（尽管在编写剧本方面新唐人和大纪元更胜一筹）、海量报导国内社会矛盾、贬低人民文化素质、撰写商业界竞争下落败者的故事（原因多为落后产业淘汰，但多会顺带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夸大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影响、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等报道。在撰写类似报导这一点上，台湾和欧美日许多商业媒体的观点总是一致，与此同时又会出现一些评论，说某些经济体比中国更成功。例如宣称印度经济会比中国经济GDP 增长率更高，而当印度经济遇到危机时，又转而说外国公司与其在中国投资，还不如选择墨西哥。如果墨西哥又出现了危机，他们马上又会炮制出另一个地方，像是肯尼亚，或是高盛集团在金砖四国后又创造出的其他名词，例如灵猫六国、高成长八国、金钻 11 国等等，只要不是中国。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目的，阻挠外国和台商企业来内地投资。尽管中国本身资金足够充裕。但是外资的关键技术和管理经验，至今对中国发展还很重要。而对台独企业来说，由于技术优势差距不如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来得大，因此这么做的可能还有另一个目的，即误导其他台商，使其不愿到内地投资，台独企业便可扩大在内地市场的份额，继续受益于中国政府的优惠政策。



第三个目的，或许也是更为阴险、隐晦的目的则是转移焦点，由于三十多年来各国政府推行学术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是涓滴经济学），在放宽金融管制、减税、私有化等政策下，贫富差距严重扩大，长期积累的仇富情绪在经济萧条时一举爆发，因此政经高层便发挥他们最擅长的事，制造其他矛盾来转移穷人与富人的矛盾，就像美国选战一样，台

湾选战也善于打出中国牌来应付，由于有中国内战和冷战反共阵营的背景，中国威胁论在台湾更是大行其道，使独派能更轻易的操作民意走向，以诋毁蓝营或是统派，呼吁财富合理分配的声音虽然不小，但似乎总是被仇中的舆论所盖过，或是被导向为针对蓝营，而对绿营不利的，如近期所爆料的民视、柯建铭、李登辉等人与陆资企业的不明关系，也只会被冷淡处理。

总结以上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台独诈骗集团擅长玩弄两面手法，在台湾煽动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或“台湾民族主义”和反共思想来搏取民意和政商利益。在内地则是隐藏身分，不断吞食中国政府给予的红利。或许这些人心里真的有过搞台独的想法，但从行为上看来更多只是想获取利益而已。然而他们的两面手法还能持续多久？

台湾和西方媒体的报道的确会让人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这几年也有许多企业撤出中国。但结果是会让他们失望的，商人的眼光是雪亮的，中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从 2007 年的 747 亿美元，一路增加到 2014 年的 1195 亿美元，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去年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更多达 23778 家。原因在于随着内地工资上涨，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即低成本的劳动力不再，商人逐渐关注越南、柬埔寨等工资成本更低的国家，所以低端产业转走了，多数台商倒闭或迁移原因也是如此。而另外一方面，由于看重了中国的市场和研发人力资源，有 31% 的企业还是决定要到中国从事研发，高端产业，如波音公司在习近平访问西雅图后决定到中国设厂，而先前不断叫嚣着要将工厂迁往印度的郭台铭，新建的工厂却还是落脚在河南郑州。

政治方面，由于台独势力气焰嚣张，不断引起美国的担忧，当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台海飞弹危机后，1998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中国提出了三不政策（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台湾不应加入任何必须以国家名义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陈水扁执政时期，两岸局势对立，美国便称台湾是麻烦制造者。近年来由于希拉里提出重返亚太政策，加上台湾经济状况严峻，台独势力再次兴起，甚至积极配合日本新安保法案与美国南海政策，意图再使两岸对立。

然而，台湾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台独势力指望美国动用全部资源与中国大陆全面开战，美国是不会做的。美国知名右派智库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Ted Galen Carpenter 在 2005 年出版《即将来临的美国为台湾与中国的战争》America's Coming War with China: A Collision Course over Taiwan 一书，在全书结尾得出结论认为：

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而不提供安全保证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承认，即台湾

是美国的一种有限的或边缘性利益，而非至关重要的利益；

对台湾的安全保证需要承担巨大的而非极小的风险。即使一场最初仅限于台湾海峡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也可能会升级以至失控，而置美中两国决策者的意图于不顾。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程度的风险只能在保卫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时才能承受，而维持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并不符合这一标准；

政策建议认为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

十年过去了，中美两国不断加强经济合作，中国军事实力迅速提升，在国际议题上也不再是只有美国一家主导，尽管中美双方时有摩擦，但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谁能保证台海开战时美国一定会出兵对付中国？同样，台独势力在中国有无数资产，一旦交战，中国政府必然会没收资产，台独势力会甘心放弃数百甚至数千亿资产？别忘了钟屿晨的 Facebook 发言曝光后，她是如何辩解求饶，而厦门市政府也没有放过她和她家族的企业，在反服贸闹剧过了一年多后，已经开始针对多个支持台独和反服贸的企业与人士（包括艺人，例如歌手黄安于 11 月 20 日报歌歌手卢广仲）进行调查。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从这些台独分子不一致的言行举止来看，他们是会为了自身庞大的利益而出卖他们创造的所谓“台湾人”和“台湾国”的未来，这也是笔者称他们为诈骗集团的最大原因，如果还有人甘心受骗的话，只能说很抱歉，没有任何一个检察官会愿意帮你追讨权益。



（责任编辑：王志浩）

路在何方——中国外交篇



【编者按】自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外事活动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一方面，中国积极构建对外合作的制度基础（如 2014 年亚投行的建立），提升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拓宽双多边合作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中国的这些行动是否是对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的挑战？本期《闻道》推出“路在何方——中国外交篇”专题，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目的性进行探讨；对中东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双多边合作的历史进行梳理，探讨其现实性。国际关系从来都不只是大国关系，对“边缘”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可能为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China's New Diplomacy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Methods, Obj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Hajer MZOUGH^{*}

1.Introduction

From being the emblem of a glorious civilization as the “Middle Kingdom” to experiencing downfall as the “Sick Man of East Asia”^①; China today is advancing its “peaceful rise” for the whole world to witness and eventually embrace^②. Its long and complex history has been a major influence to shaping its involvement, and interactions, with different parts of the globe.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s already pass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untry has known many successes as well as some failures when it comes to i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t home and abroad. Still each new leader, of this ever growing and developing nation, is trying to draw lessons and learn from previous mistakes to make it into stepping stones for future successes.

In recent years, as China has been commonly viewed as the next “superpower”; how to cope with this newfound national and global potency has become a major concern for foreign policy makers around the world. But what is equally, or even more, important are the ways China itself channels its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gards to its own changing position. China’s interes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dates back to the Cold War,

^{*} Hajer MZOUGH,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中国研究项目” 硕士研究生。

① The phrase "sick man of Asia" or "sick man of East Asia" originally referred 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when it was riven by internal divisions and forced by the great powers into a series of Unequal Treaties, culminating in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phrase was intended as a parallel to "sick man of Europe", referring to the weakening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② "China's peaceful rise" (*Zhōngguó hépíng juéqǐ*) or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was an official policy in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u Jintao. See Guo Sujian (2007). *China Journ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28–230.

when Beijing presumed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ver the revolutionary agenda of uprisings in Africa, Latin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nd elsewhere. Since the early 1980s,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Third World” has shifted, but its desire to lead in promoting the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the “South” has persisted^①.

Starting the 1990's, however,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broadened its global footprint in several dimensions, be it pragmatic-economic, or political-ideological. Although China's relations with major power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Japan, and Europe have received main attention in the last century, Beijing's growing engagement with nations from the less developed “South” has only recently been discerned or probably re-evaluated for its implications. Identifying itself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Modern China has learned to grow a special regard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②. Seen as extremely important sources of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as growing export markets for its manufactured goods, and also as supporters to its multilater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latel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becoming the favorite target for Beijing's policy.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although distinctively approached by China, they reflect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when it comes to the PRC's interests targeted at the two regions. Furthermore, geographically speaking the Arab World overlap both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and most of the Middle East. Whereas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foreign affairs the Arab World region is generally identified as MENA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hina's own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gion,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iffers

① By the of 1980s China had lessened or discontinued its support for revolutionary and liberation movem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shifted toward cultivating state-to-state relations with established governments. See Wang Yizhou (2011),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a, 1978, 2008*. Leiden. Boston.pp.39 – 43.

② Former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claimed during his speech at the Party's 90th anniversary in July 2011 that “China is still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Source : http://www.china.org.cn/china/CPC_90_anniversary/2011-07/01/content_22901507.htm.

in designation, as it prefers to call it Western Asia and North Africa^①. However, this may also imply China's own distinctive ideology towards the region.

In this paper, I will be exploring Beijing's new approach and policies related to MENA and Sub-Saharan Africa, as driven by its broader national interests, which are to susta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ecure its need in oil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preserv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protect China's sovereignty claims, and expand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As I will try to discuss the kind of implications such a global influence can have on other "superpowers" in the world, namely the United States.

This article will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parts. In the first one, I will try to bring forward China's main interests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and the means by which Beijing is pursuing its economic strategy in these two regions. In the second part, I will devote the discussion to China's current geopolitical agenda in these two of the world's hottest spots, the main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shaping of such an agenda, and China's proposed solutions. The third chapter will be dedicated to revealing som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and soft-power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on the United States' own involvement in the regions, and whether the U.S. and Chinese interests clash or converge in this sense. Finally in the conclusion, I will bring to light some limitations of Beijing's recent foreign strategies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both in ideology and practice, as I will try to present some future aspirations fo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ising star of Ch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Western Asia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

2.China,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 Relation that is based on Mutual Economic Interests

China's reemergence as a rising global power essentially depends on its economic success, which is often perceived as a miraculous phenomenon.

^①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and in case the term MENA is used, it refers to Algeria, Bahrain, Egypt, Iran, Iraq, Israel, Jordan, Kuwait, Lebanon, Libya, Morocco, Oman,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Qatar, Saudi Arabia, Syria, Tunisia,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Yemen.

However, this success is not a result of mere coincidence; China has planned, organized and structured this growth for a very long time.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position in the world today, China is quite aware that, above all, it has to secure its economic growth. For this end, China has developed a coherent and effective policy to assure its present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necessities and as well its future requirements.

Hence, it should not come as a surprise that Beijing's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have seen a renaissance in recent years. Since Deng Xiaoping's pragmatic policy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the late 1970's^①, China has been fostering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No longer considered as solely ideological allies that may support China's communist agenda,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resent for Beijing many opportunities: sources of oil and raw materials, new markets for its products and possible partners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is section, I will focus on China's economic policy and interests in the MENA region and sub-Saharan Africa, which are expanding and diversifying by the day. Being China's most significant oil and primary sources suppliers, and representing some the largest markets for Chinese exports, countries from the regions are also trying to benefit from Beijing's valuable financial aids, investments and varied forms of partnerships.

2.1 Energy Securi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spite its vast landmass, the PRC only has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world's known oil reserves. An oil exporter until the early 1990s, China imported 3,384 thousand barrels of oil per day in 2005^②. China's demand for energy is at the forefront of its MENA and Africa strategies.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like Saudi Arabia, Iran, Oman, Iraq, UAE and Kuwait account for at least 51% of China's crude oil imports by the year 2013^③.

① See Wang Yizhou (2011),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a, 1978, 2008*, Leiden, Boston, pp.39 – 43.

② Source: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4–2006.

③ Source FACTS: global energy, global trade information services, 2013.

China is so far Iran's top oil market. In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from 2004 to 2007, Sinopec has signed two agreements with the Iranian Petroleum Ministry. Further in 2009 the Iranian government announced a new natural gas deal, according to which China will hel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ffshore South Pars field – believed to be part of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natural gas reservoirs^①. However, and despite Beijing's efforts to disregard the U.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and to keep strong economic ties with the country, China's oil interests were eventually affected by Iran's difficult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Concerned by Iran's supply stability, China lessened its crude oil imports from the country and shifted its focus somewhere else in the region.

Since China and Saudi Arabia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in 1990,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developed steadily, with increasing exchange of visits and coopera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Except in 2006, Saudi Arabia has since been China's largest oil supplier in the Middle East. Currently Saudi Arabia supplies at least 19 percent of China's total crude oil imports, making it China's largest source of oil, both in the region and globally^②.

Among Middle Eastern producers, and in addition to Saudi Arabia and Iran, Oman and Iraq, respectively, exported the crudest oil by volume to China in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12 to August 2013. Qatar and Yemen are also China's third- and fifth-largest sources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respectively^③. According to the 2012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China's reliance on oil imports from MENA will probably grow.

To mitigate the continual growth of China's dependence on the region's energy exports, Beijing is enhancing its overall engag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but further Chinese companies are assertively seeking to expand their investments in Africa's energy industry. Africa is a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energy companies since the continent has a sizable share of the world's most desirable crude.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the

① "Reports: China Deals for Iran Oil," *CNN*. December 9, 2007.

② Source FACTS: global energy, global trade information services, 2013

③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Analysis: China," April 22, 2013.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CH>

multinational British Petroleum (BP), Chinese imports of African oil increased more than 71 percent between 2003 and 2005. About a quarter of the PRC's total oil imports come from African nations, including Sudan, Chad, Libya, Nigeria, Algeria, Gabon, and Angola^①.

Although Beijing's energy purchases from each African country make up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total Chinese imports, they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share of the African oil producers' exports. For instance, while Sudan accounts for less than 6 percent of total Chinese crude imports, roughly 50 percent of Khartoum's oil exports go to China. Beijing imports a quarter of Angola's oil and an increasing percentage of exports from Equatorial Guinea, Nigeria, and Gabon^②. Most of these African nations are poor countries and petroleum exports account for a sizable part of their GDP. As such, the effect of China's energy purchases on these countries' domest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noteworthy.

Oil is not the only commodity China is hunting for in the African continent. Beijing imports mineral resources, steel, cotton, copper, cobalt, platinum and timber from the continent. As the world's largest copper consumer, China has made sizable purchases of copper from African producers like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DRC), and Zambia^③.

Home for the second largest deposits of platinum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more than 40 other minerals, including ferrochrome, gold, silver, copper, and uranium; Zimbabwe is an unrivaled attraction to China in the region. Zimbabwe's leaders are aware of China's hunt after raw materials for it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y use their country's natural resources to draw in investments and other forms of support from Beijing^④.

Several countries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sent cotton to China's textile factories. Eighty-five percent of China's cobalt (a key component in cell phones, laptops, and batteries) come from the Republic of Congo, the DRC,

① Source: www.uscc.gov/hearings/2005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5_07_21_22wrts/shinn_david_wrts.htm.

② *Lehrer* (July 5, 2005), Available at www.pbs.org/newshour/bb/asia/july-dec05/china_7-05.html

③ See www.usatoday.com/money/world/2005-06-21-africa-chinausat_x.htm.

④ See www.state.gov/r/pa/ei/bgn/5479.htm.

and South Africa^①. Moreover, Africa is a primary source for Chinese demand for illegal timber and ivory. Due to the secretive nature of black-market timber and illegal ivory trade, accurate calculations of these imports would be impossible. But the availability of both resources o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expert testimony confirm a dynamic trade^②.

Beijing offers a range of incentive packages to sway resource-rich African nations. It has offered loans and grants, debt relief, weapon sale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tudent scholarships, and approved a variety of country-specific requests. It has fin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oads, modern hospitals, and even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new Ministry of Justice building in Angola), and supplied millions of dollars in loans and financing to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oil-rich nations. In the same way, China has always formed a strong opposition to the Western inter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 such as the US war on Iraq and later UN attempt to send forces to Syria. Of course this was partly, if not mainly, due to its substantial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Beijing has even contribu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Iraq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agreed to forgive a large part of Iraq's debt, provided scholarships for Iraqi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and provided further financial aids to the country.

2.2 Trade, Aid and Investments

Trade: Recently Beijing has been viewing the Middle East not only in terms of its value as a source of oil but also in the context of its huge potential as an oil services market and trade partner. By 2001 China has signed almost 3,000 contracts with the different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states for labor services. And in 2004 the six GCC finance ministers visited Beijing, where they signed a "Framework Agreement on Economic, Trade,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agreed to negotiate a China-GCC free trade

^① Source Danna Harman, "China Boosts African Economies, Offering a 'Second Opportunit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5, 2007.

^② In the wake of the deadly floods along China's Yangtze River in 1998, Beijing imposed domestic logging restrictions. As a result, Chinese firms must look overseas for timber, and have increased imports from Africa and other supplier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etween 1998 and 2005, Chinese timber imports from African nations such as Liberia and Gabon surged, and with them China's role in the black-market timber trade grew.

zone^①. Between 2003 and 2012, China-Middle East annual trade increased more than twelvefold. China in 2009 overtook the United States to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to Middle East^②.

Although China runs a trade deficit with countries from the Middle East (due largely to its heavy reliance on energy imports from the Persian Gulf), the region constitute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export market for China, as much as 121 USD billion in 2012^③. The majority of these exports are light manufactured goods, communications and acoustic equipment, furniture, toys, building materials, machinery, textiles, and stationery, among other items. The Middle East also represents a large export market for Chinese service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structi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finance sectors. Chinese state-owned two largest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the region (*Sino Hydro* and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have built dams, highways, mines, airports, housing, water distribution networks, stadiums, irrigation projects, power stations, and other facilities in Iran, Oman, Qatar, and Yemen.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such as *Huawei* and *ZTE*) provide services in at least six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Bahrain, Iran,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Both companies in recent years reportedly sold or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sale of embargoed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to Iran in violation of U.S. sanctions^④.

When it comes to Sub-Saharan Africa, there is consistent economic logic to China's activism in the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tistics, two-wa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rose from 10.6 billion USD in 2000 to 40 billion USD in 2005 and continues to increase^⑤. Whereas in the case of oil-rich African nations such as Angola, Sudan, and Nigeria, Sino-African trade seems to be balanced, Beijing's exports dominate its bilateral trade

①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set up in 1981, is composed of Saudi Arabia, Bahrain, Kuwait, Oman, Qatar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② See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via CEIC database. <http://www.ceicdata.com/en>.

③ Sourc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written testimony of Dawn Murphy, June 6, 2013.

④ Source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1/31/us-huawei-skycom-idUSBRE90U0CC20130131>.

⑤ Craig Timberg, "In Africa, China Trade Brings Growth, Unease,"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2006.

relationships in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The growth in China-Africa trade is quite impressive but needs to be evaluat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otal world trade and global economic trends. In addition, this kind of unbalanced growth entailed that some sub-Saharan African nations now run a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As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rapid inroads made by Chinese producers have also increased tensions in some parts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①. Nevertheless, China continues its efforts to secure more predictable market access to Africa.

Investments: China's invest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is also growing.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lows to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ached 1.5 billion USD in 2011^②. Much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MENA is in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sectors. Chine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funding, or have agreed to build railways in Egypt, Iran, Israel, Libya, and Saudi Arabia. State-owned China Harbor Engineering Company is investing in port projects in Kuwait, Saudi Arabia, and Qatar.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helps China build goodwill in the region and increase its access to Middle Eastern, European, and African markets.

Accordingly, both China's state-run and private investments have grown dra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More than 800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investment projects in 40 Africa countries. An important and underestimated component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it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China's financial commitments to Afric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have witnessed quite a remarkable increase between 2001 and 2007. About 70 percent of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has been in just four countries; Nigeria, Ethiopia, Angola and Sudan. China also financed and provided equipment for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backbone systems in

① Talking Points for Deputy Director-General Qi Jianwei of the Department of West Asia and Africa Affairs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at the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hinese Follow-up Committee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and African Diplomatic Envoys in China (Posted on th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rum official Web site, May 24, 2005). www.focac.org/eng/zt/zfhzltcsh/t196993.htm.

② Ministry of Commerce (China), "2011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eijing, China: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2, pp. 74-76.

Ethiopia, Sudan, and Ghana. With its focus 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China has allowed a natural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to flourish^①. Such a complementarity suggests that the current pattern of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will continue to grow.

By far, China's largest investments in Africa have been in resource extraction, mainly oil and minerals (such as copper and iron ore) in countries like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Gabon, Guinea, Zambia, and Zimbabwe. Interestingly, a World Bank study argues, contrary to some current research, that only 7 percent of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s directly linked to resource extraction, where Chinese companies make a "net-negativ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resources for export to China. As a result, one can argue to which extent China's exports and investments in Africa have fostered a "win-win" situation, as Chinese commentaries suggest? And whether they have not actually reinforced political frictions with disenfranchised nations in Africa?

Aid and Financial Services: China's economic footprint is also truly global, not only in terms of trade or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but also in services and as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aid donor in Asia and Africa. Thus, In addition to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Beijing encourage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grants, debt relief, and low-cost loans to African countries. Examples of Chinese donations include a 1.3 million USD "technical assistance" grant to Kenya in 1996, 6 million USD and 2.5 million USD grants to Zambia and Nigeria in 2003, respectively, and a 3.72 million USD grant to Niger in December 2005^②. While these totals may seem small by Western standards, they are buying influence in poor African nation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used debt relief to assist African nations, effectively turning loans into grants. Since 2000, Beijing has cancelled the debts of thirty-one African countries. Dur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China-Africa

①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paragraph is taken from 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2009, p.p 151

② "China Grants 750-Million Dollar Debt Relief to Africa," *People's Daily*, September 6, 2003; "China Provides Aid to Zambia," Xinhua, December 4, 2003; and "China Grants 3.72m Dollars in Aid to Niger," Xinhua, December 31, 2005.

Cooperation Forum in 2000 and 2003, China reduced or wrote off almost 2 billion USD in debts owed by African nations. Later in 2006, at the same occasion, Beijing pledged an extensive package of development aid that included grants, loans,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which was China's largest commitment of aid to Africa in decades.

China's willingness to provide debt relief has dedicated it to Africans while pressuring Western countries to begin similar programs. Beijing, however, also uses this tool as political influence, as its reprieve can only be granted after the African nation broke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China's pattern of using development aid to facilitate market access in the African continent is very similar to that it uses with countries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increase both its economic leverage and its general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China has provided development aid and infrastructure support to numerous Middle Eastern nations, most notably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and Iran. China has also engaged actively in multilateral discussions about Iraq's future. As previously noted, it even contributed to Iraq's reconstruction by agreeing to forgive billions in Iraqi debt and offering millions in humanitarian aid, in 2007^①. The Chinese support for the new Iraqi government soon paid off as the latter gave its first contract to develop an Iraqi oil field to a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y in mid-2008.

When it comes to financial services China is rather active in this sector throughout the region of the Middle East. Five regional banks have signed cross-border RMB trade settlement agreements, enabling the region's based companies to settle payments with Chinese suppliers. China's four largest state-owned banks operate in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which likely will become the first market for RMB conversion and clearing outside East Asia.

With the dramatically grow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nd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regions; how is China trying to channel and organize its different engagements within these two regions? In the

① "China Agrees to Cancel Iraqi Debt", China Daily, June 21, 2007.

following part I will try to touch upon some of the major ways that Beijing is employing to sustain and regulate such economic ties.

2.3 Methods of Engagement and Partnerships

Beijing's methods have matured as China's economic system has developed and demonstrate the increased sophistication with which China's leaders handle commercial relatio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countries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has taken varied forms. Eager to demonstrate its commitment to multilateralism and reduce concerns about its growing strength, Beijing now engages energetically in signing formal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nd creating "cooperation fora" of its own among countries from the regions. China is also giving more, free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policies and flexible governmental measures to it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the two region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China promoted a New China-Afric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the continent, according to a white paper released by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July 2014^①. In the regions of Middle East and Africa, China shares what it refers to a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countries like Algeria, Egypt, Kenya,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hese partnerships vary in depth and nature of cooperation. While some have a security component, most emphasize economic cooperation, as with the Sino-Saudi "strategic oil partnership".

"Cooperation fora": The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CASCf) and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are China's primary multilateral venues for promoting its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reg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dentifying and developing export markets. For example, the China-Arab States Economic and Trade Forum, established under CASCf in China's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in 2010, serves as a "bridgehead" for China to develop "an open inland economy, emphasizing ...Arab League countries and Muslim regions."^② In November 2006, China hosted the third ministerial meeting in Beijing, where President Hu

① See the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fmprc.gov.cn/zflt/eng/zxxx/t1173107.htm>

② Qian Xuewen, "Sino-Arab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Situations, Tasks, Issues, and Strategies"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2011.p.p 71-72.<http://research.shisu.edu.cn/picture/article/13/1a/61/2a6075914baf96f497dd535e44a6/221d8186-90ef-4e68-92be-ab52fd835095.pdf>.

Jintao's pledged to distribute 5 billion USD in loans to Africa over three years, and create a 5 billion USD 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 to encourage Chinese companies to invest in Africa^①.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trade fairs”: Energy exports aside, much China-MENA trade is facilitated by trade zones and wholesale trade fairs. China and Egypt launched the Egypt Suez Cooperation Zone in 2009. The zone facilitates exports to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Europe. Dubai's Dragon Mart is the largest trading center for Chinese goods outside China. The Yiwu International Trade Mart, in Yiwu, Zhejiang Province, claims to be the world's largest small commodities market and attract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rab traders each year.

China's trade ties with the region could expand with a planned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and the Gulf, which includes Bahrain, Kuwait, Oman, Qatar,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he proposed agreement would cover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Meanwhile, China's leaders have continued to cultivate bilateral ties and even military-to-military ties with key states throughout the developing world,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is may raise the question that to which extent is the PRC's policy towards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purely economic-pragmatic? And whether Beijing's diplomacy of “non-interference” can actually be maintained in practice as well?

3.China's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and Interests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Generally speaking, different literatures on modern 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tend to distinguish three main phases shaping these rela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first period or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in the 1950's, during which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ere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ideology and practical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China used solidarity with the “third world” to

^① See www.worldpress.org/Africa/2554.cfm.

distinguish itself from the bipolar Cold War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portrayed by China as “hegemonic powers”^①.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Chinese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were driven largely by id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s Beijing broke from its solidarity with postcolonial governmen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began to suppor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movements within many of these countries. Later during the 1980s,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came one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ased on common aims^②.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ina portrayed itself as an attractive economic partner and political friend. However, more than a simple friendship, today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constitute two key components in China’s larger strategy to cultivate political support, ensure domestic stability and control, and to bolster its claims to Taiwan. Beijing also sees the African and some Middle Eastern nations as valuable backers of its claims to lead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in the resistance against American “hegemony.”

3.1 Beijing’s Policies towards Instability in the Regions

China faces several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nstability, regime changes, and power shifts in recent years have probably demonstrated to Beijing that its preferred “low-key method” of managing its relationships in the region is unsustainable^③.

“Military-to-Military ties”: One of the most intriguing facets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African countries is military cooperation, sales, and assistance. Although the secretive nature of these operations makes them most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document, Chinese firms are among the top suppliers of conventional arm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In its January 2006 Africa policy white paper, Beijing openly discusses the use of military patronage: “China will

① In late 1953, Premier Zhou Enlai outline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s the framework under which its foreign policy would be conducted. The Five Principles—mutual respect for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nonaggression, non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all appealed to a developing world that, like China, had felt the brunt of Western colonialism.

② See Deng Xiaop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economic_reform

③ “low-key method” here refers to China’s non-interference policy.

promote high-level military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actively carry out military-relate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t will continue to help train African military personnel and support defense and army building of African countries for their own security^①.

In an effort to increase its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 continent, Beijing has extended military-to-military ties and arms sales to dozens of African governments. However, these ties are not to be seen as a move from China to boost its military strength, but rather to support resource-rich African nations and protect Chinese commercial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To secure its state-run companies’ abundant oil investments in the region, Beijing has established its most extensive military ties with Sudan. Chinese made arms were supplied to the regime during the two-decade-long north-south civil war, and these arms remain dangerous to Khartoum’s armed forces today. There are also an undetermined number of Chinese military personnel stationed in Sudan to secure its investments. Also, Beijing has close military ties with Zimbabwe whose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several purchases of military equipment in the last decade. And it even sells large quantities of arms in East Africa; namely Somalia, Ethiopia and Eritrea^②.

Bilateral ties, especially under the domain of military cooperation, have been increasing between some Middle Eastern capitals and Beijing in the past few years. China is both the recipient of advanced weapons from Israel and a supplier of weapons to other Middle East countries. Despite its small size, Israel is an important supplier of high-tech weapons to China^③. Chinese weapons started to enter the Middle Eastern markets as early as 1970’s with major buyers in Egypt, Iraq, Iran and Saudi Arabia. China’s alleged weapons sales to Iran and Iraq had certainly raised eyebrows, not only in the region, but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as well. In the case of Iran, China is believed to have helped their militarily in several areas, such as conducting training of high-level

① Source <http://www.china.org.cn/e-white/index.htm>

② China was once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Somalia’s weaponry, and while Ethiopia and Eritrea were embroiled in conflict (from 1998 to 2000, and in 2005), China was deepening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extending arms sales to both countries.

③ Especially that the U.S. and EU still maintain much of the Tiananmen-era sanctions to ban high-tech and military sales to China

officials on advanced systems, and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missil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Sino-Egyptian cooperation extends to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form of regular high-level contacts between Beijing and Cairo. China's solid political and military ties with Egypt are quite controversial because of Egypt's own pursuit of nuclear technology. Another country from the region with which China's defense cooperation has been gaining strength recently is the UAE. Chinese expertise in gathering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defense technologies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the UAE as it finds Chinese arms inexpensive in comparison to Western imports. Despite its policy of noninterference in foreig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inese weapons have ended up in the hands of African rebel groups^①. China's military sales in Africa are troubling, but there is, however, another aspect of China's security presence in Africa that holds promise, and which its involvement in many of the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the regio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Beijing increasingly views stability in countries from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as essential to protecting and advancing China's expanding interests and ensuring China's future security. Starting 2001, Beijing began contributing large numbers of peacekeepers to United Nations' missions in Africa. Hundreds of Chinese peacekeepers were sent t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Liberia, and others more sent to help in Sudan. According to China's defense minist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nt 550 peacekeeping troops to Liberia in 2004, including thirty-five medical staff for a UN hospital^②.

Some of China's efforts to promote 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include offering support for the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process, and other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hough, historically speaking, China has strongly

① Chadian rebels, for instance, who tried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in April 2006, used Chinese-made arms that reportedly came via Sudan. According to Amnesty International, China has also aided rebel groups in Angola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② "Chinese Peacekeeping Troops Leave for Liberia." Posted on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ustralia Web site, dated March 17, 2004. <http://au.china-embassy.org/eng/xw/t75244.htm>.

supported the Palestinians^①, Beijing now maintains relatively positive ties with both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And despite that Beijing remains cautious about becoming entangled in the conflict; it has since the late 1990s indicated a desire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process. In May 2013,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sued a “Four Point Proposal” emphasizing a two-state solution, peaceful negotiation, the “land-for-peace” principle, and “a great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urgency”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solve the conflict^②.

China has also participated in four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2001; namely the UN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UN Iraq-Kuwait Observer Mission, UN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 and UN Supervision Mission in Syria. As of September 2013, China had four peacekeepers in the UN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and 343 peacekeepers in the UN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③.

While, Chinese ties with rogue regimes and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arms sales to the region have in the past undermined peace and security; integrating Chinese forces into UN efforts to mitigate conflicts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build military-to-military ties, political capital in Western nations, and authority on a domestic level.

3.2 Ensuring Domestic Stability and Control

“The Taiwan issue”: The PRC’s rivalry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on Taiwan stems from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1949, when Chiang Kai-shek’s Nationalists lost to Mao Zedong’s Communists and fled to the island. Africa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hina in this regard. Although, China today enjoys the vast majority of African nations’ support in its efforts to isolate Taiwa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re remain some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nations that uphol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frica continues to be a key battleground for Beijing and Taipei’s so-called

① Beijing first expressed support for Palestinian statehood in 1955 and provided arms, military training, and other aid to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through the 1980s.

② Xinhua, “Chinese President makes four-point proposal for settlement of Palestinian question,” May

6, 2013.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05/06/c_132363061.htm.

③ Source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contributors/2013/sep13_3.pdf

“dollar diplomacy,” as they compete to establish ties with as many nations as possible.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even crossing its own principled line against interference in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in carrying out a strict enforcement of its “One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run-up to Zambi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September 2006, for instance, China’s ambassador publicly threatened that China would sever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y should the opposition candidate, who had character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state”, win^①. Many African nations see the “Taiwan issue” as a necessary part of their diplomacy with Beijing, one that would probably cost them nothing but can pay dividends. Today, only five African countries maintain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lthough they represent about one-quarter of all Taiwan’s formal diplomatic partners. They include Burkina Faso, Gambia, Malawi, Sao Tome and Principe, and Swaziland. While 22 nations around from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Central America and West Africa, still diplomatically recognize Taiwa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essentially completed its global quest for diplomatic recognition.

“Separatist Movement in Xinjiang”: Unlike in Africa, China does not need to compete sturdily with Taiwan to win over diplomatic allies in the Middle East. Rather, one of China’s main objectives in it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Middle Eastern, and some North African, countries is promoting domestic security, particularly in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home to many of China’s ethnic Turkic Muslims). Some preceding ethnic and political unrest in Xinjiang has, in the past, attracted support from overseas Muslim groups, particularly in the Middle East^②. Beijing fears these overseas groups could encourage what it refers to as “separatist” mutiny. In its diplomatic engagement with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with CASC, China solicits support for its policies to suppress “separatist” activities in Xinjiang^③. Therefore China’s major security concern in the Middle East is not competition

① Derek J. Mitchell,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② Al Qaeda’s vow to avenge the deaths of Uyghur Muslims killed during the 2009 unrest in northwestern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highlighted security challenges China could face from terrorism

③ For example, the 2010 CASC Communiqué states that the organization’s Arab countries are “against religious extremist forces or ethnic separatist forces engaged [in] terrorism or anti-China separatist activities.”

with Taiwan but its own northwest fro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eks diplomatic support from Muslim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to cut off any kind of financial, political, or other support for radical groups. Further, in addressing its urgent domestic instability in Xinjiang, China has redefined its engagement with the Gulf region in general and Saudi Arabia and the UAE in particular.

The Arab Spring: According to Dr. Murphy,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Arab Spring, China’s concern regarding domestic stability in relation to the Middle East has shifted from issues related to Xinjiang to a concern over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Arab Spring-style upheaval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China.”^① Starting in 2011, Chinese officials sought to ensure that unrest did not manifest in China by suppressing Arab Spring-inspired “Jasmine Revolution” protests, censoring related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emphasizing through official and semi-official media outlets that popular calls for democracy across MENA were misguided. China was, somehow, unprepared to respond to the sudden political upheaval and regime changes of the Arab Spring. This likely is due to Beijing’s inclination to cultivate relationships with ruling parties and its overall lack of experience in the region. It is true that the new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and North Africa regions may at present pose a threat to China’s existing geo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Nonetheless, in the long term, this new situation may actually offer Beijing some strategic gains and opportunities. The fact that American credibility in the MENA region is currently at an abysmal low, with U.S. policies and actions complicating the situation even more,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escalating violence and instability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as well as the Iranian nuclear crisis, provide Beijing with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enhance its geo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end, China’s goals and interes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re mutually growing and strengthening. For instance, China’s need for secure and reliable supply of natural resources, including energy, has led to relationships with

^①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written testimony of Dawn Murphy, June 6, 2013.

Islamic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at have helped prevent external support for Uighur insurgents in Xinjiang. China's aid and trade with countries from the two regions have assisted its endeavor to diplomatically isolat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Taiwan. And its actions to reassur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its "peaceful rise" have enhanced China's standing as a leader, and a model, to many of these countries as well. To achieve all these objectives, Beijing employs methods, previously mention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support, military patronage, peacekeeping and diplomatic support, and recently China is promoting a new "soft approach". These strategies, taken together with China presenting itself as an alternative to an unfair, hegemonic West; have helped Beijing secure its interests in African and West-Asian capitals.

4.China's Soft Approach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Beijing's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have seen a renaissance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concluded a series of notable agreements for energy and other resources with developing states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Chinese businesses have awoken to the trade, investment, and market opportunities of these less-developed regions. Chinese leaders are spending more and more time visiting and hosting counterparts from these regions to buil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discuss cooperation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Government-sponsore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language schools,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other forms of aid and assistance have increased China's "soft power" influence in many areas^①.

For many African and Middle Eastern governments this may present an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was even termed the "Beijing Consensus"^②. Beijing's exercise of soft-power in the regions, by means of friendly diplomacy and without 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is projecting a

① See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② "Beijing Consensus" is a term, first coined by Joseph Cooper Ramo" to refer to the political and especially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began after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Deng Xiaoping (1976)

favorable image of China today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especially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Although, China has never expressed its desire to replace or supplant the United States in its role of security provider in the Middle East or Africa; it is still debatable whether the two countrie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s converge or clash.

4.1 A Soft-Power that led to Global Influence

"Soft power," as defined by Joseph Nye, is the "ability to get what one wants through attraction rather than coercion or payments. It arises from the attractiveness of a country's culture, political ideals, and policies." Nye adds that soft power is more than "image, public relations and ephemeral popularity" but involves a very real power to achieve objectives^①. In this respect, China has been lately enhancing its public relations to promote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particularly in the developing regions, such as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ts outreach has expanded rapidly and become more coordinated in recent years, reflecting an ambition to have global presence and influence over time.

"China's Soft Approach": China's soft approach goes beyond provision of infrastructural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encompass humanitaria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imed at promoting China's image and influence. China's use of charm or "soft influence" in Africa dates back to the 1950s and 1960s, when its agricultural, medical, and military training programs first began. Today, cities throughout China and Africa host yearly gatherings designed to foster goodwill and personal ties. For instance in August 2004, Guangzhou hosted the China-Africa Youth Festival, and Beijing hosted the third ministerial meeting and first Summit of th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rum in November 2006.

On the other hand, Beijing set up the Africa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Fund, in the year 2000, to provide personnel training to 10,000 Africans. This fund has sponsored over three hundred courses and trained hundreds of African personnel in areas of diplomacy, economic management,

①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national defense, agriculture,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al treatment^①.

Medical cooperation is another traditional form of goodwill building. China deployed its first medical team to Africa in 1964,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Algerian government. Since then, China has helped forty-seven African nations develop their health services, and over 15,000 Chinese doctors have treated roughly 180 million African patients^②. Chinese medical schools and physicians also train African doctors, and provide medicine and equipment free of charge to African countries. Recently during the Ebola cris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spatched a mobile laboratory team to Sierra Leone in order to support Ebola response efforts at the China-Sierra Leone Friendship Hospital, which was built in 2012 with assistanc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poorer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such as Yemen, China has also provided extensive health aid and medical assistance. More than 2,000 Chinese medical personnel were sent to Yemen in the past 40 years. In July 2007 China's health aid to Yemen was formalized with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health care, in keeping with China's recent pledges to deepen health cooperation with all Arab League nations^③.

Tourism is another element in China's soft approach. Beijing is encouraging Chinese tourism in Africa, with an eye toward developing cultural and business ties.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on tourism have already been signed between China and Ethiopia, Mauritius, Kenya, Seychelles, Tanzania, Zimbabwe, and Tunisia. The Egyptian Tourism Authority is basing part of its future tourism strategy on attracting Chinese tourists. Since China and Egypt signed an agreement in 2001 to open Egypt to Chinese tourists, the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to Egypt has been tremendously growing in the recent years. Chinese tourism to Dubai has also more than doubled between 2004 and 2006 simply upon the introduction of direct flights by Emirates Airlines.

① See www.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China-Africa/82628.htm#.

② See www.jamestown.org/publications_details.php?volume_id=408&issue_id=3491.

③ Source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 d., http://www.moh.gov.cn/sofpro/cms/previewjspfile/ldzz/cms_0000000000000000087_tpl.jsp?requestCode=22550&CategoryID=5927

Bringing African students to China to study is another approach Beijing uses to project a positive image in Africa. Between 1956 and 2005, China awarded approximately 15,300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to students from fifty-two African nations. Beijing also seeks to establish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se institutes provide a range of programs at leading local universities, funded by Beijing and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training. About 1,500 Egyptian college students study Chinese annually, and up to 1,000 Egyptians outside of universities can study at the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and the Egypt-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①. Centers for studying China are multiplying in the Middle East. As with other cultural initiatives, China’s scholarship programs develop trust by investing in long-term relationships with elites in the regions. Saudi students are studying directly in China on scholarships awarded by Chinese companies operating in Saudi Arabi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so offering scholarships directly to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for further training.

The growth and dynamism of China make it, lately, a country of increasing interest to governments and popu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China benefits now that people in the regions see it as a country of remarkable promise, yet one which is not seeking to exploit the peoples or resources of the regions in a neocolonial way. That is, generally speaking, Africans and Middle Easterners see Chinese policy in their regions principally as an exercise of soft power rather than hard power. However, and despite its avowed disinterest in power politics, Chinese power in the regions is destined to become more balanced between hard and soft power over time. As 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grows, China will find itself tangled with many more issues in regards to keeping stability and ensuring security in the regions.

As China today is hardly working at promoting a powerful and appealing international image of itself, and quite succeeding at it in some parts of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from the regions have been eager to deepen their ties with China. Many of them seek to use a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to

① “China, Egypt Sign Agreement on Establishing Chinese University,” Chin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Network, April 27, 2005, http://www.edu.cn/Internationaledu_1499/20060323/t20060323_124312.shtml.

supplement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times to give themselves the option of greater distance from Washington. If this is the case, then what kind of consequences this might entail to the U.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s? And how would we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respective regions?

4.2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The decline in world opi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has contributed to China's attractiveness. U.S. observers, including the media,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potential for strategic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However, U.S. and Chinese interests overlap substantially.

Historically speaking, China largely has avoided challenging U.S. influence and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when key Chinese interests are at stake, China has made use of its permanent membership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oppose U.S. policies and objectives in the region. David Shambaugh -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expert on Chinese studies - claims that the major them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that the two big powers are closely tied together with extensive cooperation and growing competition, a "new normal" he calls "coopetition"^①.

“Cooperation”: At first glance, both U.S. and China have an interest in empowering developing nations of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o meet their domestic challenges and in preventing the emergence of failed or failing states that could become breeding grounds for terrorism,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nternational crime. Both countries recognize the dangers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 emanating from the regions and know their own security is intimately tied to the stability, security, and overall well-being of the weakest and most unstable of these regions.

In practical terms, China's attention to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closing the wealth gap between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worlds should not be contrary to U.S. interests, nor should U.S.

^① David Shambaugh, *Tangled Titan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2013. p4.

attention to good governance be fundamentally contrary to China's interests. Indeed,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both countries have extensive aid programs to assist with these regions'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health. The two donor countries might usefully coordinate their efforts to ensure maximum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for aid recipients. Even in the seemingly competitive arena of energy,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profound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a free flow of oil and natural gas to ensure the health of their increasingly intertwined economies. Greater dialogue and coordination of energy policy, including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 would serve both sides and help mitigate the eventual yet counterproductive rivalry that seems to be taking hold in this arena.

“Competi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lear that Chinese and U.S. interests in the developing regions of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diverge in important areas. Most prominently, China's noninterference policy has clashed with the attemp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mote good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reform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regions that have poor records in this regard.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ep and longstanding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which it seeks to protect and advance through economic engagement,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nd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As China's interests and presence in the region grow they inevitably will impact the U.S. objectives and influence there. Washington's commitment to promoting more transparent,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strict solutions to deal with economic problems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over the past decade, fed suspic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se prescriptions seemed only to cause turmoil and economic hardship even as the U.S. economy thrived. Hence som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emergence of a “Beijing Consensus,” in which nations follow the 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may supplan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his is in fact gradually enhancing 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regions at the exp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health issues, human rights, building democracy, and the search for non-Gulf oil sources are

likely to remain priorities in Africa. Neither Beijing nor Washington wants Africa to become a region of aggressiv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However, given competing interests for energy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and divergent views on democratization and human rights, China's African strategy will require creative and nuanced responses from Chinese but especially American policymakers. Although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China's proactive strategy in Africa remain in doubt, Beijing's reach into Africa will almost certainly deepen.

Some countries, such as Egypt, seem especially eager to court Chinese interest. Egypt capitalizes on its status as both a Middle Eastern country and an African one to draw attention. Although, it constitutes one of the United States' most important allies in the Middle East; looking forward, Egypt will not only look to the West. Egypt is already the co-chair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n Cooperation, and its minister of the economy vows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China will become Egypt's leading trading partner^①

By contrast to the U.S. China is new to the Middle East and offers an inspiring model for how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can grow and prosper in the modern era. Beijing recognizes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external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as been formulating its regional policies with this in mind. Recently, however, Beijing has been more willing to assert its priorities and worldview, even at the expense of its broad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Beijing's relationship with Tehran and its position on the Syrian conflict undermine U.S. objectives in the region. Again Dr. Murphy testified that China's position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n Syria represents China's most strident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gion to date and suggested China's position on Syria could represent a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Middle East policy toward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assert its own interests even if at the expense of its broad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②.

① See "The New China Syndrome," *Business Today Egypt*, November 2007, <http://www.businesstodayegypt.com/printerfriendly.aspx?ArticleID=6998>.

②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written testimony of Dawn Murphy, June 6, 2013.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mpete or cooperate, however, the developing world may ultimately benefit. China's emergence as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yer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has already prompte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sider closely China's impact on U.S. global interests and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regions themselves. Meanwhile, China's outreach has offered many nations from the regions a strategic opportunity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velop a more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Whether sparked by bitterness over perceived disregard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favor of U.S. own geopolitical or moral goals; anger over U.S. prosecution of the war on terrorism, war in Iraq, and handling of the Israel-Palestinian conflict; or any number of other grievances, nations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have felt increasingly alie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leaving an opening for China. Nonetheless, it is unlikely that China will seek to directly challenge the United States in any of the two regions in an aggressive or high-profile manner,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Beijing remains committed to keeping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on a positive and cooperative track so Chinese leaders may attend to their priority interest of tending to China's more important domestic challenges.

In the end,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n issues such as noninterference, good governance, and other principles, will neither lead to overt conflict nor dissipate substantially in coming years at least.

5. Conclusion: Limitations and Future Aspirations

Although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are a growing part of its larger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se new policy directions continue to receive little attention in either academic or policy circles. Most books and essay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eal with the topic only peripherally, as part of works 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nd the Wes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largely indifferent Russia and a United States preoccupied with engagements stretching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afforded China an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engage Africa – and more recently,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U.S. prestige in a post-Arab Spring region, the Middle East. As a result, China has become, “an alternative global power point” in the region^①. Beijing’s strategy in these regions has been designed to ensure access to energy and other critical natural resources, open new markets for exporters, and enhance China’s ability to preserve its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fora and institu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rovision of infrastructural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ithout conditions or lectures; commitment to noninterference in affairs of other nations; attendance at, and hosting of, annual meetings with regional organization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priority attention to “win-win” solutions and equality among states; and constant public statement of its loyalty to the interests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s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nation,” have all appealed to developing nations from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Easier said than practiced, China’s charming promises and perpetually alleged aspirations could not possibly be completely altruistic, especially when considering China’s contemporary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the ways Beijing is reengaging these regions for highly practical reasons. Also, despite its efforts to remain totally pragmatic and avoiding the trap of engaging others nations’ domestic affairs; China today finds itself more and more entangled in political unrest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on the one hand due to its growing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finds the role of a global decision-maker quite irresistible. Hence, what kind of shortcomings and future challenges does all this bring to 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relations wi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5.1 Limitations

While many nations are benefiting greatly from China’s thirst for natural resources, citizens in Western Asia and Africa, complain that competition from low-quality Chinese imports is dooming local industries, and murmur about the prospect of Chinese “neocolonialism” that may reduce them over time to

^① As Zimbabwe’s strongman Robert Mugabe has previously claimed.

economies based on resource extraction rather than the healthier and m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light industry. This coupled with Chinese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policies turning a blind eye to corruption and poor governance, and maintaining some perilous arm sales in the region; may have caused more harm than gains, according to some Africans as well as Westerners.

Further, China, basically seeking pure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now faces several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in the Middle East. Instability, regime changes, and power shifts in recent years likely have demonstrated to Beijing that its preferred low-key method of managing its relationships in the region is unsustainable. Also, Beijing's positions on Syria and Iran implicate China in violence,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weapons proliferation and put China at odd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gion.

On a domestic level,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Middle East post-2011 revolutions, China is clamping down on the Internet and jailing human rights lawyers, once again torpedoing its "soft power" campaign. China's political ideals, while perhaps popular among some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s inspired by China's combination of astoun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ict political control, do not yet capture the global public's imag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nd while Chinese diplomats in the Middle East profess some confusion at why their relatively modest efforts at cultural bridges draw so much concern from the West, U.S. influence and prestige began to wane in the region as the latter is lately pivoting towards the East.

5.2 Future Aspirations

Western observers have predicted for decades that the "sleeping dragon" would someday wake to become a maj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 in regional and world affairs. Nonetheless, the pace and scope of China's emergence over the past generation has been nothing less than incredible. Inde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ions are watching closely how Beijing uses its growing influ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s an indication of what kind of power China will be as it grows.

Beijing's official documents refer specifically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a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goals to promote a multi-polar world and democratiz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uch of China's outreach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seeks to advance this multi-polar agenda through engagement in regional initiatives and gestures of "South-South" solidarity. Beijing has often forme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nd other relationships with states that share an interest in fostering a more "multi-pola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apparent counterpoint to American power. China values unity with Middle Eastern, and especially African, countries to protect its interests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forums where human rights or other sensitive issues may lead to external interference in its internal affairs.

In the years to come,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mportance to China will grow apace, not only because of China's need for raw materials and export markets, but also due to its desire to lead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future prospects for Chinese soft power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whether China becomes a stable, secure, prosperous, and just nation. Given China's substantial domestic problems, it is unlikely that many nations will choose to blindly follow its example, unless China demonstrates its staying power as an economic success story and constructive political actor around the globe. So, whether China will ultimately change much of it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lenges that it keeps facing lately on the mainland and abroad in regions such as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s quite probable if not inevitable at some point.



(责任编辑：刘娅楠、杨静、刘畅)

利益攸关方、建设性合作者与命运共同体倡 导者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合法性与 合目的性

陈子越*

北极地区^①，在地理上指的是“北极圈（北纬 66°33′）以北的地区，包括北冰洋及其沿岸的亚、欧、北美三洲大陆最北部和岛屿”^②，共有 8 个国家的领土自然延伸到北极地区以内，分别是：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俄罗斯以及美国，这些国家也被称为“环北极国家”。北极，拥有着丰富的资源储备和便捷经济的新航道，在全球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建设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而目前，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冰层的融化速度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资源开采和北极航道开发趋于便利化，北极事务呈现出涉及的领域及国家范围更加宽广的局面。

中国，最北端为北纬 53 度 33 分，与环北极国家中的俄罗斯接壤。作为域外国家中的近北极国家，中国对于参与北极事务一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北极科考站黄河站的建立、以正式观察员国身份对北极理事会的加入、与环北极国家日益密切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等做法都反映出中国对北极事务的积极参与。但是，同时必须认识到的是，受制于没有明确的国家北极战略、与环北极国家战略互信的不足、参与议题的过于狭窄等因素，中国在北极事务的实践中面临着合理性、合法性及合目的性上的缺乏，面临着严峻挑战。

目前，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冰层的融化速度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为北极事务带来了一些新变化。资源开采的便利化、新海上航线的开拓、气候变化中国际责任的承担，北极议题呈现出涉及领域、涉及国家

* 陈子越，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① 本文所述及的“北极（Arctic）”，指的是北极地区，即是以北极点为中心、以北冰洋相关海域为核心区域并且包含周边地区在内的区域。

② 孙文范：《世界历史地名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8 页。

范围更加宽广的局面。而中国的国家战略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中国政府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两大战略，为打通欧亚间的联系提供了可能性，也成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新的理论指导。

本文将从北极事务中的议题分布入手，梳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实践，指出中国在北极事务的实践中面临着合理性、合法性及合目的性上的缺乏。同时，中国北极事务实践中面临着三大困局——缺乏战略定位和国家政策、参与领域狭窄及国际合作参与不足、与环北极国家及域外国家缺乏战略互信。为了突破这三大困局，中国在北极事务中需要明确自身的利益攸关方、建设性合作者、命运共同体倡导者三大定位，通过制定完善的国家战略、参与机制的创立与完善、延伸“一带一路”战略等可行性路径，更好地参与北极事务的实践之中。

一、合作与纷争：各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现状

北极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其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个领域，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无论是域外国家还是环北极国家都在北极事务中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同时，由于环北极国家及域外国家在北极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利益，在携手应对这些区域性、国际性议题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与纷争。这种合作与纷争并存的北极治理现状主要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领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争议。领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争议这一议题是环北极国家间分歧最为突出的议题之一。1961 年的《南极条约》冻结了世界各国对于南极地区的领土诉求，而北极地区则没有这样的国际性条约。各个环北极国家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本国的相关诉求。这个问题虽然与域外国家没有直接关系，仅仅是环北极国家在主权等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但是这将会影响环北极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是北极治理面临的较为棘手的议题之一，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极事务的“主权化”趋势。

在其中，大陆架划界问题以及专属经济区划分成为了争议的重点，1995 年，丹麦和挪威就双方大陆架和渔区划分上诉至国际法院，最终由国际法院根据海岸线的特殊情况做了个案处理，最终做出裁决；关于巴伦支海大陆架的划分则一直争执不休，挪威的谈判对象也从 70 年代的前苏联变为

21 世纪的俄罗斯，最终在 2007 年才最终达成协议。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则一直没有明确的裁定，2001 年以来，俄罗斯、挪威、加拿大等国都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的诉求，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的归属成为北极地区各国争议的焦点。更为严重的是，这项争端面临着旧约与新法难以协调的窘境。1920 年签订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是一贯解决北极地区领土争议的纲领性文件，但其中关于领海宽度的问题与现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规定存在争议，同时由于成文时间较早，当时并没有成形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规定。如何将“旧约”并入“新法”的轨道中成为了北极治理的难点之一。

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极地地区作为地球上最后两片较少受到环境污染的处女地，其生态的保持对于全球的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有着基础性作用。无论是环北极国家还是域外国家都希望能够共同参与北极环境治理之中。然而，由于北极特殊的气候条件，其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容易受到全球气候的影响。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带来了气候变暖，在北极地区使得冰层的融化速度显著加快。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并不仅仅是环北极国家的责任，世界各国都应当承担应尽的义务。但是在涉及减排问题等核心问题上各国都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而在北极国家内部，虽然北极理事会形成了若干有关环境保护的倡议，但是各国仍然把国家发展置于环境保护之前，不愿为北极地区环境治理提供更加切实的行动。

资源开采。北极地区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环北极国家都针对着北极地区的丰富资源制定出各国的国家战略。俄罗斯在资源勘探领域拥有着领先的地位，在其国家战略中提出要把北极地区打造为主要能源基地。挪威将资源开发作为其国家战略的核心，在巴伦支海相关海域进行油田开发。丹麦也开展了海上油气开发，格陵兰岛是丹麦能源战略的重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分的争议也延伸到资源开采领域，位于争议地带的资源成为北极国家竞相争夺的焦点。

科学考察。相比于近年来兴起的资源开发，北极科考有了较长的发展史，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可以追溯到 1958 年。而 1990 年成立的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淡化科学考察中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色彩，协调各国参与科学研究工作之中。然而，由于缺乏正式的法律体系对北极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活动加以规范，目前北极科考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局面，特别是

北极国家为了争夺大陆架归属而进行的海洋测深和数据采集活动，对北极地区的海洋生态及共同开发提出了挑战。同时，无论是北极国家还是非北极国家，目前的北极科考更多地是为主张本国权利而服务的，各国之间在地图绘制、海洋测绘、破冰船巡航等领域呈现出的是相互竞争而各自为战的局面，科学研究领域的共同治理任重道远。

二、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实践与困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对外依存度的增加，中国对于全球事务的关心与日俱增。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参与到北极事务之中，从个别科学家的参与到政府的推动，从科学考察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从北极治理的“门外汉”到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总体上来看，中国北极治理的参与呈现出参与部门拓展、领域增多、话语权增强的趋势，但是也面临着缺乏战略定位和国家政策、参与领域狭窄及国际合作参与不足、与环北极国家及域外国家缺乏战略互信三大困局。

（一）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实践

相比于环北极国家和其他域外国家，中国参与北极治理实践的时间相对较晚。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科学家高登义以个人的身份参与联合国联合北极科学考察，开创了中国开展北极科考的道路。从这个时间开始，中国正式踏入了参与北极治理的域外国家的行列之中。纵观二十多年的实践历史，中国从民间参与转变为官方主导、官民互动，参与北极治理的领域也呈现出扩展的趋势，国际合作程度也日益加深，中国作为域外国家，在北极治理相关议题上的参与程度也逐渐加深，中国从北极治理的“局外人”更好地转型为“参与者”。具体而言，如表一所示，中国的参与实践可以被划分为官方表述、科学考察与国际合作三大类。

表一：中国在北极治理中的实践简表

| 事件类别 | 时间 | 事件 |
|------|--------|---|
| | 2009 年 | 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在报告中指出：“北极事务关乎中国自然、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
| | | 北极理事会春季高官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高风表示：“中国有 |

| | | |
|------|----------|---|
| 官方表述 | 2013 年 | 意愿也有能力为北极理事会工作做出贡献促进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
| | 2013 年 |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北极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依据国际法积极参与北极合作，在北极事务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
| 科学考察 | 1991 年 | 中国科学家高登义参与北极科学考察，成为中国北极科考的先驱。 |
| | 1995 年 | 中国科学院正式加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
| | 1999 年 | “雪龙号”穿越北极圈，首次完成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科学考察。 |
| | 2003 年 | 首次在极地运用自行研制的水下机器人进行海洋观测。 |
| | 2004 年 | 中国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
| | 2008 年 | 首次在北极地区开展地球物理考察。 |
| | 2010 年 | 首次依靠中国科考队自身力量到达北极点。 |
| | 2012 年 | 首次实现北极及亚北极区域准同步考察。 |
| | 2014 年 | 完成累计 90 个站位的多学科综合观测、监测和采样作业。 |
| 国际合作 | 2012 年 | 中国与冰岛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冰岛共和国政府关于北极合作的框架协议》。 |
| | 2010 年以来 | 中美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纳入中美高层对话机制。 |
| | 2013 年 | 《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合作协议》达成，正式成立“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 |
| | 2013 年 |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等 8 家科研机构成为北极大学联盟成员。 |

自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北极科考活动日益增加，到目前为止，自主进行的已有 6 次，以科学家个体名义参与的、与其他国家联合进行的在北极适宜科学考察的夏季更是每个月都在进行。数据上的支撑也为中国北极实践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2012 年 4 月，时任中国国家总理的温家宝，应邀访问冰岛和瑞典。联系到中国在此前成为北极理事会“特别观察员”的背景，这一次的访问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自中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总理对冰岛进行的首次访问，也是在中国北极战略深化开展的时间节点对环北极国家进行的国事访问，北极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成为了中冰、中瑞合作的突破口。在其后的国际合作实践之中，中国以与冰岛、瑞典的合作作为突破口，以此加速融入

北极地区的国际合作之中。

2012年,雪龙号科考船成功开展了穿越北极点的试验性航行,为开通中央航道进行了有益尝试。2013年8月,中国远洋航运旗下“永盛”号商船便经过此条航线到达鹿特丹,成为极地航线扩展的范例。2014年,中国政府正式发布《北极东北航道航行指南》。中国商务部指出,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将为中国带来“降低出口商品运输成本、航道开通带动的船舶建造和基础设施提供新的商机、提供新的能源及资源进口渠道”^③三方面的益处。中国在北极航道开发工作中有着卓有成效的实践。

（二）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困局

虽然中国在北极事务的参与中呈现出参与领域扩大、国际合作程度加深、作为域外国家的话语权增加等发展趋势,但是依然面临着合理性、合法性及合目的性三个方面的困局。

从合理性的角度而言,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缺乏合理的战略定位和完善的国家政策。目前,中国政府官员虽然在一些场合对中国在北极治理中的实践有过概括性的论述,但是究其本质,这些官员多为某个北极会议代表团的团长,在官员级别和话语权威性上仍然不足,其发言也带有较为浓厚的外交辞令色彩,并没能真正解释北极地区的中国国家利益的落脚点。这不仅仅将会为中国北极政策的制定带来阻碍,更会加深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误解,不利于国际合作的开展。

相比于其他域外国家而言,我国目前的北极政策显得较为零散,多见于中国国家海洋战略之中,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化的北极政策。因此,没有北极政策的统一指导,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则显得较为盲目。

从合法性角度而言,中国北极事务参与的领域狭窄及国际合作程度不足。中国的北极科考集中在气候分析、地球物理学考察领域,显得较为局限,在北极航道研究领域相对不足,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原住民权利、国际法在北极治理的应用等)仍然处在起步阶段。而从整个北极事务的角度来看,中国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对北极新航路、北极资源开发、原住民权利保护等领域较少涉足。

中国目前在北极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对象仅仅包含冰岛、丹麦、瑞典以及处在对话阶段的美国,形成框架性协议的至今只有冰岛一个国家,对

^③ 商务部:《北极航道商业化运营的前景》,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jlyd/201309/20130900299022.shtml>, 2016/2/2 访问。

于环北极国家中的其他国家显得关注程度相对较低。特别是与中国构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俄罗斯，在北极治理领域的合作水平远远不及在经贸、军事、国家战略层次上的合作水平，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伙伴关系带来的巨大战略互信红利。

从合目的性角度而言，中国与环北极国家及域外国家缺乏战略互信。一方面，由于中国自身的北极战略定位尚不清晰，这不仅为中国自身参与北极事务带来了阻碍，也为其他国家了解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真实意图带来了阻碍，这将反映在双边及多边合作从开始就难以找寻突破口这一问题上。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冰岛共和国政府关于北极合作的框架协议》的签署，是中国与环北极国家就北极治理相关议题签署的第一份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份国际合作框架协议，这时距离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参与北极科考的1991年已经过去了22年。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自身的北极战略定位尚不清晰，容易坐实其他国家“中国威胁论”的口实。从环北极国家的角度而言，这八个国家对域外国家的进入一直持有的是警惕的态度，特别是对国家利益和在北极中定位不清晰的国家，这种警惕甚至上升为敌意。虽然环北极国家间存在着矛盾，但是其应对内部矛盾的前提在于争取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从其他域外国家的角度而言，中国在信息共享、联合科考等领域并没有给予合作的机会（域外国家间的信息共享一直欠缺），中国被这些国家定位为在北极事务中的竞争者而非潜在的合作者。2011年，中国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曾希望购买冰岛东北部的一块土地，经过冰岛政府的多次延搁、“改买为租”等多次波折之后，这一计划还是宣告流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14年黄怒波购买挪威北极圈内的一处土地的进程之中。虽然针对的是中国商人的个人投资行为，但是从中可以体现出环北极国家对于商人背后的国家色彩的疑虑。

三、利益攸关方、建设性合作者与命运共同体倡导者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目的性

针对以上三大困局，可以发现，这三大困局分别折射着不同层次上中

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困境，同时，为了突破这三大困局，也需要引入不同层次上的概念对困境加以释疑。

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角度而言，缺乏合理的战略定位和完善的国家政策这一困局的根源在于中国未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加以明确，对中国在北极地区“利益攸关方”的定位不够清晰。

利益攸关方，本身是一个社群主义的概念，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则是更加接近于全球治理的概念，强调一个国家超越了本身国界的范围，参与到全球性、区域性议题的治理进程之中，既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又向着国际社会施加着影响力。具体到北极事务的情境下，环北极国家毋庸置疑地成为北极事务的利益攸关方，而域外国家是否是北极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则需要考察其对北极事务施加的影响以及北极事务在其国家利益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针对中国北极事务实践中合理性缺乏的困局，破解的办法即是将中国做出是北极利益攸关方的明确定位。这也需要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做出上述两方面的考量：中国对北极事务施加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有哪些。

通过上述对中国北极事务实践的分析，可以将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影响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参与北极地区的科学考察活动，为北极事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数据上的支撑；参与北极治理机制（包括北极理事会、国际气象组织等）的建设，推动北极地区治理机制的完善化；拓宽国际合作的渠道与领域，与环北极国家及其他域外国家建立了一定的合作机制。

而针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有哪些”这一问题，由于中国缺乏官方文件和相应的北极政策加以明晰，本文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归结为资源价值、航运价值、安全价值、国家战略价值四类。

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合法性角度而言，北极事务参与的领域狭窄及国际合作程度不足从外因角度上看是由于北极地区缺乏合理的机制和法律规范；而作为能动者和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应当一方面从现存的法律法规出发，承担应尽的义务，享有应得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使中国成为北极事务的建设性合作者，主动投身北极地区新秩序的建立与完善的进程之中。

一方面，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有着合法性。虽然北极地区长期缺乏统一的国际法体系加以规范，但是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匹次卑尔

根群岛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个体法律都从不同角度对北极治理提出了规范性限制，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都应当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参与北极治理。而在义务的另一面，这些条约也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权利上的保障。作为《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缔约方，中国有权在该群岛及其所属海域开展科研及其他条约赋予的权利，中国公民也可以自由进出该地区进行任何不违反挪威政府法律的任何行为；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有权进入北极公海地区进行科研等活动，并享有北极公海地区和区域的相关权利。

另一方面，中国对北极治理机制发挥着建设性作用。总体上而言，北极治理机制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法律作为保障，而是仅仅依靠着国际法、多边协议、多边条约乃至倡议等“软性规范”加以约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也为中国建设性作用的发挥创造了现实可能性。宏观上，中国作为国际法缔约方的一员，在国际法与国际制度规范领域中可以承担法律规范完善者、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议者的角色；中观上，作为域外国家的中国，可以与其他域外国家协调彼此关切，对北极治理做出共同的、有针对性的利益表达，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良好补充；微观上，中国可以通过与域内外国家的国际合作，形成在某一领域有建设性作用的双多边条约，成为地区机制的先行者。

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目的性角度而言，对于一个国家参与北极事务需要有一定的评价体系与标准，尤其是作为域外国家的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不仅需要合理性与合法性作为依托，更需要的是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对于中国的北极战略的认可，由此才能产生更深层次的战略互信。

在合理性与合法性达成的基础上，中国可以独立地参与北极事务的实践之中，但是，由于北极事务作为一个公共问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都无法做到“完全独立”的参与，因此，需要引入一个评价性的标准，这便是合目的性在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实践中的重要性。

合目的性，本身是康德美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用人的活动具有目的的观点对事物性质所作的一种评价性规定，是事物具有满足、实现某种目的的性质与能力”^④，而在广义下的评价体系中，合目的性是一种对自身行为的判断与评价。具体到北极事务中，“合目的性”对于一国开展北极事务实践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他国基于一定的认识与标准对行为做出价

^④ 高清海：《文史哲百科全书》[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第265页。

值判断，从而影响着双边乃至整个区域内的合作。

针对中国在北极事务中国际合作力度不足、与环北极国家及域外国家缺乏战略互信的困局，能够达成合目的性的考量成为了突破口，因此，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提及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可以成为化解合目的性困局的推动力，中国应当在北极事务中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

中国最北端为北纬 53 度 33 分，与环北极国家中的俄罗斯接壤，地缘上属于近北极国家。气候变化、北极航道开发、北冰洋海域污染治理等全球性问题更是进一步拉近了北极地区与域外国家在议题联系上的距离感。更进一步地，环北极国家更加关注的在于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有形物品的主权与归属，中国作为域外国家则更加看重北极地区对中国国家发展的影响，对于环北极国家间的争夺并没有关注和参与，这也使得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并没有介入主权等国家利益中较为敏感的层面，避免了直接招致北极国家的强烈反对。这是中国在北极地区倡导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可能和基本前提。

目前中国在北极治理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与环北极国家及其他域外国家之间战略互信的不足，渲染北极地区的“中国威胁论”便是其中的代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所解决的就是战略互信不足的问题。中国政府可以以中欧文明对话、中美高层对话等平台为契机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打造不同文明间的包容互鉴。同时，应当通过关注北极原住民权益、参与北极环境治理与污染管控等形式展示更加负有责任的中国形象、唤起全球国家在北极治理中的责任意识，构建北极地区的命运共同体。

四、形式上参与、机制上构建、文明上互通：中国

参与北极事务的未来路径

通过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未来参与北极事务的脉络。利益攸关方、建设性合作者与命运共同体倡导者呈现出一种递进的层级关系，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未来路径可以以此被划分为形式上参与、机制上构建、文明上互通三个层次。

首先，最基础的工作在于继续推进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形式上的参与。不论在未来北极事务参与的具体方式如何，国家利益的明确和北极战略的制定应当是第一位的。当前的中国北极科学考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数据，

可以为北极地区的战略资源与战略价值做出宏观上的定位，成为中国北极战略制定的基础。

在整个北极治理的领域中，中国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对北极新航路、北极资源开发等领域较少涉足。在明确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后，可以对北极治理的领域做出进一步的拓展。我国的北极科考和北极治理参与主要集中在气候分析、地球物理学考察领域，显得较为局限，在北极航道研究领域相对不足，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原住民权利、国际法在北极治理的应用等）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因此，这些相对不足的北极治理议题可以成为今后工作的突破口，而在传统的研究领域应当做到更多的创新。

其次，目前北极治理机制建设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在于北极地区缺乏一个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法律体系加以约束以及北极治理机制存在着较多不完善的地方。这既给中国的北极参与带来了限制与挑战，也为中国在机制建设上提供了创新路径。

在这之中，建立健全北极治理的法制体系可以成为突破口，通过对北极地区新秩序的重塑，也可以使得各国可以在体系化的机制下更好地处理彼此间的矛盾，携手应对出现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南极条约》所构建的极地治理体系可以成为可资借鉴的法律体系，但是，在北极国际法体系构建中需要处理国际公域与国家主权、北极国家与域外国家的权利、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划分等多对矛盾，作为域外国家的中国在其中一些涉及本国及地区利益的领域应当充分表达自身立场，推动法律体系的完善。

最后，中国，作为北极事务的后发国家，在参与北极事务中会经常性地受到先发国家的抑制，这是每个国家在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进程中所难以避免的。中国应当从自身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在北极地区的“中国形象”在实质上是由西方媒体主导下的话语环境所建构的，无论是国家还是民众，对中国产生的误解并不是针对现实中的中国，而是针对这一个被建构出的、与真实情况有偏差的中国形象。因此，在北极地区更多地承担与中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注重中国形象在海外的传播，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宣传策略，可以做到有效应对话语霸权下的误解，为其他国家及其民众提供可资选择的、透明的中国形象。

然而，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与环北极国家以及一些域外国家在北极治理的某些议题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合作，这可以成为消除误解的契机和突破口。而针对民众中对中国的误解，拓展民间交流、利用中欧文明对话机制等文明交流与对话的平台进行文明互通，可以使得存在矛盾的文明交流互通，有效提升双方对彼此的认知水平。

在做好自身形象宣传、加强文明对话互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便是中国-北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寻找中国与环北极国家、其他域外国家的利益汇合点，延伸目前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沟通中美欧三大洲。在建构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打造文明互通互鉴，在北极地区强化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注，使得各个国家可以在北极地区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困境与挑战，打造中国-北极命运共同体。

五、结论

北极地区，拥有着丰富的资源储备和便捷经济的新航道，在全球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建设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日益受到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的重视，“北极治理”也成为了全球性议题。

纵观中国的北极实践历史，中国北极治理的参与呈现出参与部门拓展、领域增多、话语权增强的趋势，但是也面临着缺乏战略定位和国家政策、参与领域狭窄及国际合作参与不足、与环北极国家及域外国家缺乏战略互信三大困局，中国在北极事务的实践中面临着合理性、合法性及合目的性上的缺乏，面临着严峻挑战。利益攸关方、建设性合作者与命运共同体倡导者三大定位呈现出一种递进的层级关系，成为突破三大困局的发展方向，有力地解释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合目的性，中国参与北极的未来路径也可以以此被划分为形式上参与、机制上构建、文明上互通三个层次。

同时，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切口，展现的应当是中国转变中的国家战略。在新形势下，中国需要参与世界，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也需要与世界各国的紧密合作。而在此之中，参与北极事务可以作为战略转变的主要方向。参与北极事务可以体现出中国更加富有国际责任的大国形象，可以折射出更加包容、更加自信的中国形象，有助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环北极国家以及一些域外国家在北极治理的某些议题中已经有

了一定的合作，这可以成为消除误解的契机和突破口。寻找中国与环北极国家、其他域外国家的利益汇合点，这可以成为中国北极战略的下一步重点，也是形成成型的中国国家北极战略的必由路径。



（责任编辑：张莹）



“返乡体”与农裔知识分子的身份

认同困境

刘畅*

在帝制中国，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以农为本是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根基。乡村基础上的小农经济荫泽了整个传统中国。在士农工商的职业排序中，农民仅仅排在官员后面，因此在传统中国，农民在身份上，具有不差的优越感。但是到帝制中国解体后，特别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城乡差距日益加大，不仅农业、农民、农村等传统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出身、走出农村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日益尖锐，成为“问题”。回顾百年的历程，这其中经历了从虚构走向现实的过程，并在后期出现了“非虚构”的文学社会学表达形式。总之，农裔知识分子或托物言志、或介入其中、或直接呐喊，尽管方式不同，但总的来说，表达了他们尴尬的身份处境。

由虚构走向现实——从《祝福》到《一个农村儿媳

眼中的乡村图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是“返乡”小说的开山之祖，他撰写的《回乡》、《祝福》等文章影响至今。拿《祝福》来说，鲁迅通过小说中的直接叙述者“我”回乡的所见所闻，描写鲁四老爷、祥林嫂等形象，对封建社会对农村的茶毒进行控诉。

“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新党……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屋里”。^①

可见虽然出身农村，但与象征着封建宗法制度捍卫者的鲁四老爷相比，在鲁镇的环境下，“我”明显是格格不入的，用祥林嫂的话来讲，“你是识

* 刘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① 鲁迅：《鲁迅自编文集：彷徨》，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 页。

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的多”，祥林嫂也并不把“我”当作鲁镇人，而是知识阶级的代表。

但当祥林嫂问起“我”死后会不会下地狱的问题时，“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吧，从而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有”，听到祥林嫂说，“那么，也就有地狱了？”引起了我的吃惊，只得支吾着“也未必”，在祥林嫂的紧逼下，“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我即刻胆怯起来，“我也说不清楚”。^①

这段描写精彩地表现了“我”身份上的困惑，一方面，我代表知识分子，对愚昧的鬼神之说应该嗤之以鼻，但另一方面“我”身为曾经的鲁镇人，很能理解祥林嫂的处境，想设身处地地去减轻她精神上的痛苦，但是没有办法的是，正是这样的模棱两可，让“我”十分被动，最后只能用“我也说不清楚”来搪塞，“我”说不清楚的其实是作为一个农裔知识分子，自己到底应该如何自处。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我”还仅仅是个旁观者的话，那么莫言《白狗秋千架》中的“我”，贾平凹《高老庄》中的高子路和阎连科《风雅颂》中的杨科，则是作为农裔知识分子，在“离乡——返乡——离乡”这个过程亲历者，也是这段经历的异化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风雅颂》中的杨科。^②

杨科从农村出来读书，后来考研、读博、分房、评职称、当教授，一切看似一帆风顺，但背后却是人格的异化。妻子和副校长李广智偷情，他下跪苦苦哀求，另一方面，他为了在城市能够有地位，抛弃昔日的乡下恋人玲珍，还在玲珍的葬礼上移情别恋她的女儿小敏。为了私利，他将无意中卷入与学生共同抗拒风沙的正义之举，遵照学校的意思抹黑，还自愿承认患有精神病被送入精神病院，帮助校方获奖。在这个过程中，杨科丧失了农村人的朴实，也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尊严，而看到的是他在农村人民面前的自负自大，和在城市比他权力高的人面前的自卑与猥琐，这一“边缘人”的秉性让他最后自食苦果。

如果说从鲁迅到阎连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家都在或冷眼旁观或直抒胸臆地通过小说人物的描写来反映农裔知识分子人格异化的话，那么近两年，

① 参见鲁迅：《鲁迅自编文集：彷徨》，上海：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7 页。

② 田丰：“农裔知识分子：新时期以来游离于城乡之间的他者”，《宁夏社会科学》，2015 年第 3 期，第 180 页。

网络上频繁爆红的“返乡体”文章则更加直接的反映了农裔知识分子的呐喊，不管是 2015 年的《一个博士的返乡日记》^①还是 2016 年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②，其模式都是常年在城市生活的知识分子，春节回家，看到农村的萧条破败，一时情难自禁，写下或感人或震撼的文字，然后经过网络媒体的疯狂转载，吸引大众对于农村的关注，但等春节过完，这一关注也随之式微，到来年春节再来一波，周而复始。这些知识分子中有被认为是“华中乡土派”的研究者，也有非社会学专业的学者，只是单纯的抒发所感所悟。

“非虚构”的情怀——梁鸿和她的《中国在梁庄》

还有一类农裔知识分子既非纯文学的托物言志，也非蜻蜓点水地直抒胸臆，而是采取一种更为聪明的方式，以非虚构的形式，进行文学和社会学的双重介入，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梁鸿和她的《中国在梁庄》。

《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梁鸿的两部以河南省穰县梁庄为立足点的非虚构类的文学、社会学作品，一进一出，既可以看到梁庄和梁庄人在现代化大潮中的破败与挣扎，也可以看到梁鸿作为一个农裔知识分子自身身份认同的困境。在《中国在梁庄》的附录中，梁鸿用一节文字专门探讨了“我”是谁的问题。

梁鸿坦言，不是梁庄人要她写这部书，而是她自己为了精神得到救赎，找到个体精神的源头，才有了这样的作品。梁鸿通过“我”的眼睛去看梁庄，同时透过“梁庄”，“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历史形象。那么，“我”到底是谁？

“我”是梁庄的一分子，是梁庄的亲人。在里面可以看到我的堂叔、堂侄、堂兄弟姐妹，我进入他们的住所，看到他们的嬉笑怒骂。我甚至在采访奸杀老人的王家少年时，感到纠结和害怕，并以一个梁庄人的身份对他絮絮叨叨。

但“我”又不是梁庄人，每当我遇上陌生而茫然的目光时，我明白在他们眼中，我始终是异乡人。

① 人民网，2015 年 2 月 25 日，<http://edu.people.com.cn/n/2015/0225/c1006-26594099.html>。

② 中国农业新闻网，2016 年 1 月 30 日，http://www.farmer.com.cn/sh/wh/ngwh/201601/t20160130_1177149.htm。

“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风景的塑造者。^①

梁鸿认为自己的这种“重返”最终是无法抵达的。“因为你叙述完了他们后，你安然退出，任其漂流。”^②但相较于“返乡体”的作者们，梁鸿已经比较多地介入农村，从2011年开始，她陆续地参加了一些乡村建设团体的活动，成为志愿者，做宣传员，但梁鸿也坦言，就内心而言，对这些工作，其实她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更多的是为了责任而做，她更适合做一个“旁观者”、“书写者”，追求精神的自适。^③

所以，尽管梁鸿是一个聪明的介入者，但在介入之后，她依旧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尴尬，当然，最后也得益于她介入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稍微能够自适。

农裔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困境

对于农裔知识分子，不管是自鲁迅以降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是春节返乡的知识分子，抑或是更为聪明一点的，以双重身份观察农村的“非虚构者”，他们天然的会产生一种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在“离乡——返乡——离乡”中体现出“不认同农民的身份，追求城市人的身份——以城市人的身份或同情或藐视农村——农村的难以‘重返’，农村人与城市人的双重身份困境”。这样的身份认同纠结不断地在农裔知识分子往返乡村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撕裂他们的个人精神。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意识中把农村当做一个先验的破败、落后的场所，一个被现代化淘汰的地方，同时在他们的意识中，是肯定现代性的，并且在现代性的话语里面，肯定现代与非现代的二元对立。这一问题，在民国时期，晏阳初的农村研究中就有所反映，被称为“晏阳初模式”。

“晏阳初模式”及其反思

① 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65页。

② 同上书，第268页。

③ 同上书，第271-272页。

所谓“晏阳初模式”，指民国教育家晏阳初博士将农村人定性为四个特点“愚、穷、弱、私”，并试图从人性的角度上加以改造。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赵旭东教授曾撰文《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对“晏阳初模式”进行深刻反思。该文指出，尽管晏阳初提出的“愚、穷、弱、私”这四种病症在某些农民身上有所显露，但绝不是在每个农民身上都会发生这类实质性“疾患”，可是这种界定却成为一种“话语”在影响着没有去过乡村、对乡村人的生活并不了解的城市人的思维；他们大多都会相信这样的界定，进而支持对于乡村以及农民的进一步改造。即便是今天，延续这类思考的知识分子还是大有人在；他们或者是有过在乡村生活的经验，或许是访问过几户农民，或许是仅仅在乡下随便呆几天，甚至还没弄清楚一些信息报告人在乡村里的身份及其口头报告的可信度，就匆匆赶回城市自己的家中，开始撰写中国乡村问题及其出路的调查报告了。^①

此外，该文还指出，本着治病救人的中国乡村研究是毫无道德感的。因此把中国乡村研究问题化是一个不可取的研究前提。^②

而如今，这一问题可能更加深刻，因为不管是鲁迅等人的文字，还是返乡博士的呐喊，我们在他们的欢呼中看到的都是中国社会一个又一个破败的农村，同时更为让人担心的是，这些为之呐喊、为之彷徨的农裔知识分子本身，在身份认同上，由于先验性的问题，已经产生了身份认同的障碍，因此而形成的一整套关于农村的话语都难以令人信服。

中国乡村问题研究的大社会学思考

那中国的乡村问题研究应该如何进行？赵旭东教授从专业研究的角度给出了他的建议，他认为应当以社会结构的比较为核心，而非以社会问题为导向，同时加以地方志、民族志的关怀，在研究中加大地方历史感和责任感。^③

本文主要关注置身其中的农裔知识分子，从他们的身份认同出发，探究如何进行中国乡村问题研究。

① 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13页。

② 同上，第114-115页。

③ 同上，第116-117页。

首先，本文认为，不是所有的农裔知识分子都要进行乡村研究，如果没有受过比较严格的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更为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训练的分子们，应当适当的压抑住进行文学创作和即兴创作的冲动，因为很可能乡村本没有问题，或者乡村问题本来就在那里，但在他们的笔下，日益成了“问题”。这会对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造成一定的干扰，也会对网络传播下的受众造成偏见式的影响。

此外，受过专业训练的农裔知识分子，在进行这个问题研究的时候，最先要处理的问题是自身的身份认同，不要带着认同困境进行研究，如何避免这种认同困境，本文认同赵文的观点，不要先验地提出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对于现代性的问题，也要在学理上进行比较客观的思考。在至少不带价值判断的前提下进行研究。

最后，在真正进入中国乡村问题研究时，应当更具有大社会学的关怀，这里的大社会学不仅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相近学科，还要有一种更为博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关怀。本文认为，梁鸿的“非虚构”的文学、社会学双重介入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尽管在《中国在梁庄》中，社会学的成分还稍显薄弱。但这至少一方面让叙述者本人具有“介入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在出现身份认同尴尬时，可以在二者之间进行调试与转圜；另外在社会学之外，加入人文关怀，也减少了药理式的治疗研究方式，而具有更加柔软的调整空间。

结语

“返乡体”也好，农裔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困境也好，都反映了中国的乡村问题确实亟待研究，但本文认为欲速则不达。呼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需求，而不能保证这种需求是理性的，有利于问题缓解甚至解决的。在自媒体网络的传播下，很多非理性需求迅速地扩散，又迅速地湮灭，很多时候会对严肃的学术研究造成困扰，让学术研究本身也形成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困境，不知何去何从。拥抱大社会学关怀的前提是从不同层面厘清“我是谁”。

（责任编辑：刘畅）

真理、政治与共和的危机

——《过去与未来之间》读书笔记

陈永沛*

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无不追求真理，却也不拒绝“谎言”。柏拉图和尼采把政治的谎言视为“高贵的谎言”；马基雅维利通过政治和道德分离，为君主的欺骗和谎言提供合理性；霍布斯则把谎言视为暴力手段的替代，是一种相对无害的政治手段；黑格尔也认为伟人不惜欺骗人民，如果目的是建立丰功伟绩。为什么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都倾向于在政治领域中隐瞒真理欺骗大众？阿伦特给出了自己独特的回答。阿伦特认为真理具有“非政治的和潜在反政治的性质”，需要“谎言”缓和真理与政治的冲突。阿伦特进一步区分两种真理，分别是“理性真理”（rational truth）和“事实真理”（factual truth），前者自莱布尼兹以来就被认为是数学、科学和哲学的真理，后者是在人类公共生活和行动中产生的事实和事件，构成政治领域的真理。

理性真理和政治的冲突就是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和公民的生活方式的差别。基于对政治生活是一种涉及他人在场、藉由言说和行动与他人交流意见并展现自我的理解，阿伦特将真理视为一种专制的力量。真理不能从多数人中获得，也不可同多数人交流，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没有众人的参与，也就不存在“政治”。真理世界具有普遍性，而政治生活本质上是封闭的，其基础乃是信仰和意见，因此宣称是绝对真理而其有效性不需要来自意见的支持的主张，都动摇了所有政治和政府的根基。西方思想史上，理性真理与政治的对抗体现为苏格拉底被希腊城邦处死，霍布斯被教会威胁要将他的书烧掉。不过在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中，这种理性真理与政治意见的古老对抗已经消失了，现代的政治家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将各类哲学当作一种指导思想甚至意识形态干预政治生活，哲学与政治的对抗消融于意识形态对人的普遍支配。

但是真理与政治的对抗并没有随着理性真理的退场而消亡，相反，事实真理继续开启那古老的、显然已经过时的真理与意见的问题。如果说理

* 陈永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理论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性真理的本质是个人的和孤独的追求普遍真理的过程，是超越于人类事务（政治）领域的；那么，事实真理则相反，“事实真理总是与其他人相关的：事实真理涉及到时间和状况，而许多人卷入了这些事件和状况；所以事实真理建立在许多人的见证基础上，依赖于多数人的证实；事实真理的存在取决于它被人们讨论的程度，即使人们只是在私人场合讨论它。事实真理在本质上是政治的。”^①这决定了事实真理和意见之间的亲缘关系，它不像理性真理和意见一样是对立的，事实真理和意见，虽然他们必须被分开，但它们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属于同一个世界。事实养育意见，而意见，在不同的兴趣和感情的激励下，只要它们尊重事实真理，可以极为不同但仍然是正当的。除非事实信息受到保证和事实本身没有争议，否则意见自由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但是事实真理和意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还在于：是否存在独立于意见或解释的事实？阿伦特虽然承认完全不需要解释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事实必须被挑选出来，而这个挑选的原则不可能是事实本身；但是她却同时坚持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事实性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它们也不能被用来证明模糊事实、意见与解释之间的分界线是合法的，或被当作历史学家可以随意操纵历史的借口。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有权重写他们自己的历史，我们所承认的也仅仅是，他们有权按照它们的见解重新安排事实；我们并没有承认他们触动事实存在本身的权利”。^②事实不能离开意见，不能离开解释，但是却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重写、重新安排、重新解释事实都不等于触动“事实本身”。事实上，阿伦特坚持触动事实本身的不合法性有自己更深的考虑。如上所述，阿伦特一直认为理性真理与政治格格不入，事实真理却本属于政治领域。当柏拉图把哲学（理性真理）和意见对立起来的时候，政治事务作为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就和公民的生活方式对立分离了。阿伦特认为，在我们的时代，事实真理和政治之间的冲突空前激烈，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通过重新书写历史以便让某个事实或某个人（比如托洛斯基）不再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指出：理性真理的专制（无理是宗教理性真理还是哲学理性真理）在现代政教分离后不再是政治的主要威胁，现代的主要威胁变成了政治权力对于事实真理的操控。如果说，没有哪一个以前的时代会在宗教或哲学事务上容许如此之

①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21页。

② 同上，第222页。

多的意见分歧的话，那么，事实真理，如果它恰好违反了某一特定集团的利益或愿望，在今天却会遭到比以前都更大的敌意。在阿伦特看来，与其说是科学的、哲学的真理，不如说是简单的、偶然的事实，既是脆弱的，又是人类生活所绝对不可缺少的。事实真理比理性真理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伤害，它们发生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人事领域，但它却是政治领域最主要的肌体。一旦事实真理丢失了，就没有什么理性努力能把它找回来。

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理性真理的反面是错误、无知、幻想或者意见，但不可能是撒谎；而事实真理的反面则是谎言，从“精心编造的谎言”到“有组织的谎言”。“事实真理的标志是，它的反面既不是错误，也不是幻觉或意见……而是深思熟虑的伪证和谎言。”^①这决定了事实真理面临要比理性真理更加危险和困难的处境。如果言说事实真理的人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用，以便让自己所说的更有说服力，他更经常采取的方式是，花大量时间来解释为什么他的特殊真理能最佳地服务于某个集团的利益。当讲述真理的人进入政治领域并把自己和党派利益与全力组织搅在一起，他也就丧失了真理的中立、正直和独立，那就更有理由被人怀疑是一个政治人物，其所讲的“事实真理”也不过是另一个谎言。换言之，事实真理并不比意见更能自我证明。事实证据是通过目击者的见证和历史记载、文献、遗址等确立的，而目击者的见证是靠不住的、文献遗址也可以被伪造。同在处理意见争论的方式一样，事实真理也要依靠大多数人的见证，而多数人的见证不能保证不是谎言。而且事实真理的讲述者所持有的真理不像哲学家们有一个超越的根源，不像苏格拉底一样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押在这个真理上，从而树立一个典范，以这种典范的形式，来确定哲学真理不受歪曲和滥用的情况下对政治领域的教导。对于一个真理讲述者而言，极稀少的事情上他愿意以生命来捍卫某个特殊事实。“在他的行动中展现出来的可能是他的勇气，也可能是他的顽固，但绝不会是他想说出来的真理，也不是他忠于真理的品质。因为，一个说谎者为何就不能以巨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呢，尤其是在政治之中，当他为爱国主义所鼓舞，或者对其他什么合法团体心存偏爱的时候呢？”^②

在阿伦特的政治领域理论中，谎言是一种篡改事实的行动，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阿伦特认为，说谎者会假装声明所说的话不过是他的意见，

①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

② 同上，第232页。

是宪法赋予的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以此模糊事实真理和意见的界限。而且，“说谎者是一个行动者，而真理讲述者，无论是理性真理还是事实真理的讲述者，他绝不是一个行动者。”^①就撒谎是一种行动、不受真理的强制性、必然性制约而言，它是通过特殊方式在公共生活中对人的自由的证明，但同时也是“对于自由的滥用”。单纯的事实讲述一方面抵制了谎言，但是同时也放弃了政治家们行动的自由。事实的讲述者坚持不撒谎，即真诚，但是真诚本身并不是政治美德，“因为它对于世界和环境的改变的贡献确实微乎其微，而这种改变乃是政治活动的天职。”但是这里有一个例外，“当一个共同体开始固定地从事一种有组织的谎言，而不仅仅是在具体的问题上撒谎，真诚本身，没有权力和利益的歪曲性力量作其后盾的真诚本身，才能够变成一种最重要的政治素质。”^②这就是说，在一个权力当局有计划、有组织地消灭事实、集体撒谎的社会中，保持真诚、坚持事实本身就是有政治意义的，而且是有生命危险的。阿伦特说得好：“在每一个人都对在每一件重要的事情撒谎的地方，真理讲述者无论他是否知道意识到，他都开始了行动。也使自己投入了某种政治活动，因为，在他艰难保存下来的让人讨厌的事件中，他已经想改变世界迈出了第一步。”^③

阿伦特在这里引入了两种谎言的区分，即传统谎言和当代有组织的谎言。前者掩盖事实而后者则制造虚假的“事实”替代真正的事实；前者只对敌人撒谎，而后者则对每一个人撒谎。还有一个差别是传统的撒谎者自己知道自己在撒谎，自己不会相信自己的谎言，而现代的撒谎者则自己也相信自己的谎言。最成功的谎言是连说谎者自己也信以为真的谎言。当一个人的谎言获得众多人的相信时，说谎者自己常常也很难坚持自己的判断——明白自己是在撒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是离不开我们和他人共同享有的那个世界的，坚持不被大家共享的真理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有组织的谎言对“事实”的存在构成根本威胁，但是事实的可塑性并不证明事实的本身不存在，也不证明权力可以随意操纵事实。如上所述，在论述理性真理的时候，阿伦特认为理性真理具有强制性、一元性，要求绝对接受，因此理性真理入主政治会导致真理专制，具有非政治性或者反政治性；而在论及事实真理的时候，阿伦特却转而突出事实真理对于政治的积极制约性。她认为，虽然事实真理与理性真理相比离不开“意见”，

①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

② 同上，第234页。

③ 同上，第235页。

更加多元化，但是事实真理就其“断言确实性的方式而言也是与意见对立的。”意见可以讨论，但是事实真理却“断然要求对它们的承认并关上了争论的大门。”因此，在要求别人同意这点上，它和理性真理并无不同。更加重要的是，事实真理的确凿性和坚固性会对于专制者形成制约，所以阿伦特说：“从政治的角度看，真理具有一种专横的特点。它因此招来了专制者的仇恨，他们有充分理由对一种他们不能操纵的强制性力量的竞争感到害怕。”对于事实真理的这种顽固性，只有“纯粹的谎言”才能加以消除。在这个意义上，事实超越了商谈、协议和同意，所有关于它的谈论都只能在承认它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由于政治的本质就是商谈，就是“考虑其他人的意见”，所以，在此意义上，事实真理也与政治存在紧张的一面。

事实很容易被摧毁，有组织的谎言能够抹去关于所有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它们一旦消失就不再能够恢复。当谎言摧毁事实真理的时候，那些试图恢复真相的人面临的劣势是：由于事实是那样偶然，所以，真正发生的事情听起来不如取代它的谎言更加可能或更加有说服力。在谎言大面积弥漫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这样的后果是，一旦权力关系的变化强迫整个体制发生变化，并随之强迫制造一系列新的谎言，那么，整个国民中产生的结果将是一种全面的犬儒主义：拒绝相信一切。阿伦特说：“长期洗脑洗脑的最确实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玩世不恭：对任何真理都绝对拒绝相信，不管这个真理有多么可靠的证据。换言之，持续完整地用谎言代替事实真理的结果，不是谎言现在被接受为真理，而真理现在被诋毁为谎言，而是我们据以在真实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觉被摧毁了，其实与错误相对的真理范畴只是为了在世界中定向所用的思维手段”。^①真理和谎言的区别标准已经不再存在，也就是说，在政治强权摧毁事实真理的地方，它也摧毁了共享的世界，摧毁了我们的真实感，而这个世界、这种感觉正好是政治行动得以发生的空间。这是谎言统治的极权社会的最可怕结果。

因此，在阿伦特看来，在政治和真理之间划分界限，以保证政治公共领域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领域不管多么伟大，仍然是有限的，它并不囊括任何世界的全部存在。它被那些人们不愿能够任意改变的东西所限制——真理。而只有尊重它自身的界限，这个我们自由行动、自由改变的领域才能不受损害，保存他的完整性和遵守它的承诺。在现代社会，严

^①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

格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重建自由言说和行动的政治公共领域，并且为真理提供避难所才是解决政治与真理冲突的关键。

在上述理论框架下，在《共和的危机》一书中，通过观察美国政治，阿伦特总结出两种新的谎言类型：一种与源于消费社会的“形象制造”相关，用于处理公共关系；另一种则更进一步，来自于“问题解决专家”，与“五角大楼文件”的联系更加紧密。“问题解决专家”的任务，是用法则“解释和预测历史事件”，推导出某一与事实毫不相干的“真理”。在这个粗疏的“去事实化”过程中，假设、理论仿佛已成既定事实，令民众认为整场战争关乎国家和自己的未来。而在阿伦特看来，这场战争实际与国家利益无关，除了国内政治的用途，不过是实践帝国主义政策，最终目的是统治全世界。

在这种情势之下，总统和国会往往以错误判断为决策基础，自欺欺人。譬如，美国的政治家及军方人士广泛援引“多米诺骨牌”理论，强调越战失利会导致共产主义控制东南亚地区。事实上，这一理论与中央情报局的研判几乎毫无关系。“五角大楼文件”中不乏值得参考之处，却为其目标读者包括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置之不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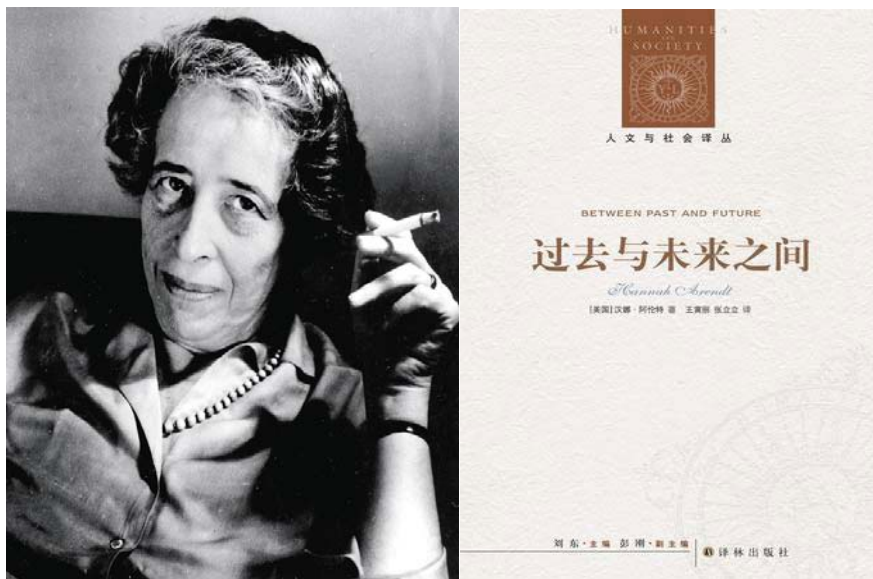
幸运的是，真理虽然脆弱，却仍有其坚韧之处。在社会中，一些由权力建立和支持的公共机构充当着“避难所”，“与所有流行的政治规则相反，真理与忠于真理一直构成着言说和行事的最高标准”，譬如司法机构、高等教育以及媒体。“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徒劳地想要隐藏的材料”，便是由《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公诸于众。媒体对事实真理的讲述，具有最直接的政治重要性。但是若媒体要成为实至名归的“第四分支”，那它“就应当比司法机构受到更严密的保护，以免除政府权力和社会压力的伤害”。《第一修正案》对言论的保护，以及那些“宁愿坐牢也不愿看着自由丧失”的人，使阿伦特相信，共和存在危机，但仍具持久生命力。在眼下这个面对政治权力、商业资本与技术发展等多重压力的时代，媒体的生存环境可能更加复杂。

阿伦特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两个政治事件中的偶发的谎言，她真正在意的毋宁说是一种“制度化的谎言”：通过不断地遮蔽现实或改写历史，使之系统地适应自身的意识形态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和事实几乎是不被需要的，它们对主政者来说反倒是一种威胁和障碍。这是一种“虚拟化”的政治，就像战争本身也逐渐虚拟化：现代人看到电视上直播的战争画面，

常常感觉那像是一场电影甚至电子游戏。她指出，美国政府在越战中并不追求达成任何实际目的，而完全是事关心灵的，“耗资巨大的整个目的就是产生出某种心灵状态”^①——美国至今仍是如此，然而又岂止是美国如此？

政治和政治哲学毕竟不是一回事。当阿伦特说“真实从来就没有被当成是一种政治德性，而谎言则总是被看成是政治事务中的正当手段”时，这表明她到底是一个政治哲学家，而非梅特涅或基辛格那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政治家尽管也有原则，但并不总是会被它束缚住手脚，否则尼克松就永远不可能访华了。现实政治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像阿伦特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理想国的状态，这既是它的烦人之处，也是激发思考的源泉。

这么说或许不算过份：阿伦特所理解的“共和”，乃是合乎公民社会价值观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一部利维坦式的国家机器。不管是政府在战争中的谎言，还是公民的不服从与异议，说到底都是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的思考，即相应的政治逻辑和表现，应符合公民的普遍认可与同意，否则他们就有权抵抗或呐喊。这符合她的另一句名言：“政治的目的在于自由。”



（责任编辑：刘一鸣）

^① 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潘兴明教授在上图作关于中英关系的专题讲座

11月24日下午2点，潘兴明教授在上海图书馆作了题为“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历史解读”的讲座，以当下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为切入点，并从历史维度对这里的“黄金时代”做出了阐释，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

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英国事访问为中英关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英关系迎来“黄金时代”。习近平访英成果显著，包括能源方面，中国核电落地英国；金融方面，中国银行设立伦敦交易中心；科技方面，不出国门享受英国医疗；人文交流方面，英推出两年多次入境签证；以及设立中英电影投资基金等等。

从历史上看，中英关系历经波折。英国是近代第一个派遣政府使团出访中国的西方大国；第一个与中国签署新约，放弃治外法权；新中国成立后，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第一个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第一个通过和平方式归还所侵占中国领土的西方国家，这些呈现出两国关系从不平等到平等的独特历史进程。

而英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有三个特点，英国外交的实用主义精神是决定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础；英国利益是英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准绳；英国以贸易立国，商业运作模式贯穿其外交行动，实现单赢是英国的外交底线。

最后从四个方面对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做出了历史阐释。论实力地位，当下中国国力明显加强是构建合作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基础之一；而两国在经济贸易、国际战略等方面的共同利益，促成了中英关系的进步；当下中英关系提升到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又一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两国从务实外交精神出发，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推动了中英关系的积极发展。

此次讲座是对当下中英关系增温趋势的探讨，从历史维度解读了当下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对理解当前国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澳大利亚华人工会成立三周年之际，我院汪诗明教授应邀发视频祝贺

2015年11月26日，澳大利亚华人工会为纪念该公会成立三周年而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我院汪诗明教授应邀发去视频讲话，以示祝贺。贺词如下：

各位澳洲友人，大家下午好！

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我叫汪诗明。恰逢澳大利亚华人工会成立三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澳研界的所有同仁，向澳大利亚华人工会的所有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澳大利亚华人公会是澳洲华人之家，是华人交流情感、工作经验以及人生感悟的场所，也是广大澳洲华人争取自身权益、期望在澳洲多元文化社会中发出自己声音的一个平台。在过去的三年中，在以陈青松先生等英年才俊的组织和带动下，华人公会在帮助华人维权、科学知识普及、就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同时，华人公会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在向澳洲朋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解读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澳中双边人文交流、加强经贸合作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受到了澳中双方有关政府部门、民间团体以及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作为华人公会成立三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公祭——澳洲华人血泪淘金梦》一书的编撰工作一经倡议，就受到中国澳研学界的重视。虽然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但参与者还是想方设法搜集相关史料，力图真实、客观和全面地反映这一段令人心酸的华人血泪史。这是一项旨在铭记历史、汲取教训以及面向未来的人文工程。目前，这项工作进展顺利。

最后，祝本次纪念活动圆满成功！祝澳大利亚华人工会不断地发展壮大，愿贵工会在维护华人权益、帮助华人群体更好地融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以及增进澳中友谊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祝各位友人在澳生活、工作愉快！

谢谢大家！

20 余名专家学者共议 2015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2015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于 12 月 14 日下午在我院成功举办。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前秘书长金应忠、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洪业等二十余名国际关系方面资深学者以及校友专家应邀出席。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会议共分为两个板块：一是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热点问题探讨，二是区域与国别问题研究。



在“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热点问题探讨”的板块中，余建华老师就中东安全局势与国际反恐问题做了主旨发言，他认为中东地区动荡和教派冲

突背后是大国关系的博弈，而中国在成为大国的道路上，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又必须有所选择，做最合适的事情。孙溯源老师以“中东大变局与美俄大博弈”为题，对中东热点问题进行了宏观的梳理。胡键老师和唐慧云老师分别就中美关系现状与2016美国大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龙静老师在谈到新形势下的中欧关系时表示，2014-2015年处于提升时期，双边关系正处于全面、稳定、健康地发展，中欧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标杆。阎德学老师以“习式天下主义与安倍和平主义”为题对中日关系进行了宏观的探讨。封帅老师在谈到当前亚太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建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时认为，亚太地区处于“历史遗留问题+当前大国战略竞争+未来的非传统的竞争”三者结合的复杂处境，亚太地区不同国际机构之间相互纠葛，相互掣肘，很难形成完整架构。如要解决问题，还需中美共治，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



在“区域与国别问题研究”的板块中，贝文力老师就“中白教育合作：进程与前景”议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展望。王海燕老师就“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发表主旨演讲，她认为，六大经济走廊中，中蒙俄最有可能实现，同时要促进上合组织协调沟通，应该更强化上合组织的作用。潘兴明老师则对“英国脱欧”的前景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预期。臧术美老师则注重欧盟治理研究的“向内挖掘”，系统分析了“地区”这一层级在欧盟多层及治理中的特殊地位。赵银亮老师在“地缘政治视角下的缅甸民主化及中国对缅外交转变”的发言中表示，缅甸的现代化导致国内不稳定，而现代性会带来稳定，缅甸是一带一路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核心，需进行全方位外交。张丹华老师、包承柯老师分别就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乌兹别克斯坦、台湾问题作了报告。陈志强老师则从法律角度详细讲解了中国海外侨民的外交保护问题。

潘兴明教授和汪诗明教授参加“中国英国史研究会 2015 年学术讨论会”并作主旨发言



由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和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英国史研究会 2015 年学术讨论会”于 2015 年 12 月 19—21 日在湘潭召开。我院潘兴明教授和汪诗明教授应邀出席，并分别做了题为“近代帝国的社会融合与种族隔离”、“新西兰南岛属‘无主地’吗”的大会主旨发言。同时，应湘潭大学历史系邀请，汪诗明教授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为该系世界史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和老师做了题为“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报告。该报告不仅阐释了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而且对最近澳大利亚派侦察机在南海有关岛礁上空巡航的背景与动机做了深刻剖析。

瓦尔代会议学术委员会主任卢基扬诺夫教授 到访我院

2015年12月19日上午,《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主席、瓦尔代会议学术委员会主任卢基扬诺夫教授(Fyodor Lukyanov)到访我院,就中俄关系与国际形势作题为《处于全球日益动荡中的俄罗斯与中国:合作路径和动因的补充》的主旨演讲。本次讲座由我院教师张昕主持,40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并进行座谈。



卢基扬诺夫教授在演讲中提到“后冷战时代的三个时期”和“四个国际体系角色”。他指出,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形成新的世界秩序,面临着艰难的转型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虽然意味着冷战的结束,但没有形成新的全球秩序,国际社会的现实发展证明所谓“西方社会的胜利”是错误的。

他认为,后冷战时代大致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三个时期:一,1991年苏联解体至2001年美国9•11事件。二,2001年美国9•11事件至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三,2011年至今。当今国际社会现实不仅证实了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模式的破灭,也表明冷战中形成的国际机制的失效。与此同时,当今国际舞台上活跃着的四大重要国际行为体——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其中中国无疑是国际社会十分重要的一极,但美国及其盟友推行的体系改革有意地将中俄排除在外,中俄也不会以牺牲行动自由为代价而融入其中。

随后,冯绍雷教授指出,《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与瓦尔代国际论坛具

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为国际形势提供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历史及现实研究。我们研究国际形势,不仅要关注当前局势的现状,还需结合历史发展的成因。



卢基扬诺夫和冯绍雷教授的现场演讲引起了在场师生的积极反响和热烈讨论,也进一步推动了学院师生的学术参与度和学术热情。

师生同联欢 猴年共喜迎

2015 年 12 月 23 日下午，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迎新年师生联欢会在逸夫楼多功能厅举行。全院教师及中外学生共同参与了此次新春大联欢，喜迎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新春佳节。联欢会上，刘军院长致新年贺词，他祝愿全体师生能够收获圆满的 2015 年，迈向充满希望的 2016 年。



联欢会在别具风情的乌兹别克舞中正式拉开帷幕。乌兹别克的舞蹈以优美轻快、复杂多变、节奏感强著称，两位乌兹别克留学生热情洋溢的舞蹈一下子就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各种节目轮番登场，异彩纷呈。



俄罗斯美女留学生带来的《俄罗斯民谣》和民族歌曲《Rejoice us》优美动听，展现了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情，引得在场观众情不自禁地随旋律打起节拍。



话剧《拯救自由》以诙谐的语言、后现代的表演方式，演绎了人们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让大家在欢笑之余陷入沉思。自由在于丰足的物质间，在理想价值的求索中，在庸常的日常生活里，还是更多的别处。



我院臧术美老师朗诵的原创诗歌《当我年轻的时候》，辞悠扬舒畅，意

味深长，感染了在场的所有观众。



艺术源于生活，我院学生结合身边发生的故事进行改编，由中外学生合作表演的相声《北京之行》以及小品《爱在华师大》，用幽默的语言、搞笑的肢体动作以及出人意料的情节，引得观众爆笑连连，现场气氛不断被推向高潮。





随后，两位中国同学带来的二次元舞蹈《恋爱循环》轻快活泼，向大家展现了青年一代的活力和朝气。



联欢会在全体教师和中外学生大合唱《朋友》中步入尾声，借此不仅表达了师生、同学间友爱互助的情感，更唱出了大家憧憬友谊坚固长存的心声。此次联欢会在同学们欢快的欢呼声和依依不舍的留恋中圆满地落下帷幕。



卫生部原外事司司长、世界卫生组织资深外交官宋允孚先生来我院讲学

2015年12月28日下午，卫生部原外事司司长、世界卫生组织资深外交官宋允孚先生到访我院，并作题为“如何做国际公务员——国际组织任职的经验分享”的讲座。我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鲁静老师主持讲座。



宋允孚先生为大家介绍了国际公务员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并用现身说法描述了自己在世界卫生组织中的任职经历，他表示国际公务员是一项很有前途的职业，但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国际公务员要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必要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宋允孚先生还向在座师生介绍了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的任职情况，他通过数据展示了在国际组织中中国国籍的国际公务员的人数比例以及中国缴纳会费的现状。此外，宋允孚先生还指出要成为国际公务员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他强调，要成为一名国际公务员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只有具备了国际视野，才能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同时他还鼓励同学在提升外语能力等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高沟通能力等软实力，要成为国际公务员靠能力也靠机遇，因此在提升自己硬实力、软实力的同时还要善于发现机会并及时为这些机会做充分的准备。

讲座末，同学们积极地与宋允孚先生交流互动，并向他提出寻找机会、提升能力等方面的困惑，宋允孚先生对此一一做了回应并给出自己的意见，讲座在热烈又积极的互动中圆满结束。



马扬·阿提拉教授与爱蒂拉·斯格蒙德女士 到访我院并作学术讲座

2016年1月7日下午，匈牙利国家行政大学国际与欧洲研究系主任、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前匈牙利驻欧盟使团高级顾问马扬·阿提拉教授与爱蒂拉·斯格蒙德女士到访我院。此次学术活动分为两部分，马扬·阿提拉教授就中东欧四国在“一带一路”中的位置作了“东欧与中东欧—中国通往欧洲之门户”的讲座。随后，爱蒂拉·斯格蒙德女士为学院师生们带来了“中国学生与学者如何申请欧盟伊斯拉谟项目”的介绍。张昕博士担任了此次讲座的主持，与马扬教授合作论文的国关院三年级硕士研究生陈曦也参加了讨论。



马扬·阿提拉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中东欧地区的历史与政治经济现状、中东欧各国间的共性与差异、以及中东欧国家面对欧盟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态度。随后，马扬教授又提到了中东欧国家关于东方国家、包括俄罗斯以及亚洲国家的政策框架。最后，教授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现状与前景，并提出双赢战略下的政策建议。

爱蒂拉·斯格蒙德女士在接下来的讲座中为大家讲解了如何申请欧盟伊斯拉谟项目。伊斯拉谟项目鼓励亚洲学生与学者前往欧盟进行学术交流。

爱蒂拉·斯格蒙德女士为大家介绍了伊斯拉谟项目的起源和历史、伊斯拉谟项目的子项目以及各个项目的申请要求和大致流程。其间陈曦学姐也分享了自己曾在匈牙利游学的经历。

这次学术讲座一方面为大家带来了“一带一路”的中东欧视角，另一方面则介绍了一条与欧洲学术圈进行深入交流的途径。

冯绍雷等出席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年会



2016年1月8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5年年会“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于北京钓鱼台大酒店举行。周边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刘军教授、郑润宇博士应邀出席此次会议。会议除介绍了2015年学会的各项工作外，杨洁篪国务委员专门前来为与会学者做了专题报告，分享了2015年中国外交进程的各项成果。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会上也做了外事工作的重要报告。此外，在下午的分组会上，冯绍雷主任就中国国际研究学界的学术出版成果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感受。



（文稿编辑：夏真真、吉普昇、陈子越

摄影：吉普昇、陈曦、周欢欢、陈雅卿、武志杰

责任编辑：陈子越）



《闻道》征稿启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管，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我们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的学人与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征稿栏目主要有国际问题研究、学术随笔（含书评）以及文艺专栏等。国际问题研究主要刊登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来稿字数在10000字左右为宜。学术思想随笔（含书评）主要刊登古今中西经典著作阅读、思想研究等方面的文章，3000-6000字为宜。文艺专栏主要刊登文化艺术类题材随笔，如文学、电影、音乐、戏曲、旅游、时尚等，2000-5000字为宜。

来稿时敬请作者注意：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本刊属于内部发行，不影响投稿之后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
2. 来稿需为word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可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注释体例。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3. 投稿作者同时需要提供200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通信地址、电话等），以便于后期邮寄期刊和支付稿酬。
4. 本刊对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实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评审意见会以电子邮件发送给作者。我们会在2个月之内给来稿作者以回复。
5. 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本刊对决定刊登的稿件可作必要的修改，不同意修改者，请在来稿时注明。

6.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414A，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闻道》编辑部，邮编：200062

网 站：<http://www.saia.s.ecnu.edu.cn>

博 客：<http://blog.sina.com.cn/u/2532279030>

新浪微博：闻道杂志社，<http://weibo.com/u/2532279030>

《闻道》编辑部





S A I A S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